

福爾摩沙的呼喚

一個紐西蘭人在台灣二二八事變的親身經歷

FORMOSA CALLING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February 28th , 1947 Incident



formerly Industrial Rehabilitation Officer in Formosa for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In memory of my father, Allan Shackleton, and of the people of
Formosa who suffered fifty years ago.*

Allan, J. Shacklenton 原作, 宋亞伯 譯述

ybsabc@yahoo.com

紀念我的父親，以及所有在五十年前遭受苦難的台灣人民。

對於下面提到的這些人，我由衷地表示感謝：

紐西蘭台灣同鄉會的廖評(益)先生，他於一九九七年透過層層管道找到擁有先父那已褪色發黃的原稿的我，並且鼓勵我將之出版。總部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台灣公報」發行人韋杰理和陳美津夫婦，總部在美國加州的「台灣出版社」發行人林衡哲醫生，他們對推動本書的出版都做了可貴的貢獻。以及旅美台灣人作家「亂 --- 惡性循環的中國文化」一書作者宋亞伯先生將本書譯成中文，還有我的兒子彼得。

C. J. 謝克頓

關於作者

愛倫·詹姆士·謝克頓於一八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紐西蘭南坎特伯里的維梅特地方出生。

就在二十歲生日過後不久，他被徵召加入「紐西蘭遠征軍」，從此經歷了兩年多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的慘烈戰爭歲月。在那二十四個月期間，他分別參加了幾次在桑美，蒙斯，加美科森林和興登堡防線上的戰鬥。事實上，他也是最初一同被徵召入伍的幾百人中唯一幸存的兩人之一。他的幸存和幾度與死亡擦身而過的經驗不但增強了他的宗教信仰，並且也使他確信戰爭是沒有用的。

戰爭結束後謝克頓先生返回紐西蘭進入基督城的「坎特伯里大學」就讀，得到電機工程學士學位。隨後得到英國曼徹斯特一家重電機械工程公司「大都會維克斯公司」提供的獎學金前往英國深造。

幾年後，由於碰上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經濟大蕭條，迫使他和他的家人不得不返回紐西蘭尋找工作機會。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他被任命為紐西蘭吉

斯伯恩一所高中的工程科主任。二次大戰期間由於他的年紀已不符合被派往海外執行戰鬥勤務的規定，他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被征召進當地的「家鄉衛隊」。

一九四六年時，他申請成為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派駐中國代表團的工業重建官員。最初他被派往上海工作，但不久由於中國發生共產黨暴動，他又被派往台灣工作。

在他抵達台灣后不久，台灣發生了反抗蔣介石軍事政權高壓腐敗統治的大規模抗議事件。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再次發現自己又處在戰場里。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聯合國工作任期結束後他返回了在紐西蘭吉斯伯恩的家。

謝克頓先生於七十歲時從教育工作崗位上退休。晚年的時候，他花了很多時間撰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個人回憶錄「往事如湮」(The Passing Years)。但這本書后來並沒有完成，也沒有出版。

謝克頓先生於八十七歲時在紐西蘭新普利茅斯去世，留下妻子和兩個兒子。

譯者簡介

宋亞伯先生一九五一年出生於台灣台北，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后曾任教台北各大補習班，業余兼民族晚報特約撰述及翻譯。一九八一年自費赴美留學，初入康乃迪克州立大學攻讀歷史博士，后轉入紐約市立大學獲廣播電視新聞碩士學位，隨后任職美洲中報編譯兼主筆。一九八九年起任職於華盛頓美國新聞總署美國之音迄今。一九八五年出版譯作「資訊的地緣政治」(The Geopolitics of Information by Anthony Smith)。一九九五年一月出版所著「亂 -- 惡性循環的中國文化」，對漢民族傳統文化做深入的剖析與無情的撻伐，傳頌一時。

本書介紹

我的父親艾倫·詹姆士·謝克頓於一九四八年返回紐西蘭后立刻撰寫了「福爾摩沙的呼喚」這本書。他當時所以撰寫這本書完全是為了和平，正義與人道，以及台灣當時情況(契)需廣為世界所知的刺激。

然而五十年來，先父這本「福爾摩沙的呼喚」始終塵封在我們家的記憶里，並沒有出版。不過無論如何，書稿里的一些內容還是曾經被喬治·柯爾的那本「被出賣的台灣」一書所引用。「被出賣的台灣」於一九六六年頭一次在英國出版。

由於「福爾摩沙的呼喚」書稿里的內容曾經被「被出賣的台灣」一書所引用，加上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的即將到來，紐西蘭台灣同鄉會乃循線查訪到我們家地址，並且力勸我們應該將先父的手稿出版。

先父是一位道德感強烈的老派基督徒紳士。從小受基督教長老教派的熏陶，長大后又成為一名具有強烈和平信念的基督教貴格派信徒。他對一九四七年發生在台灣的那些不道德事件的震驚與惶恐，整本書里處處清晰可見。

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國民黨軍隊的暴虐行徑及其所制造的血腥恐怖，顯然已超出了他所相信的道德極限。作為舊式學校教育出來的西方人，他對於一個社會即使在動亂時應該如何運作，自有其不同的觀點。

由於先父本人曾經參加的戰爭是如此「文明」(如果武力對抗可以這麼說的話)——這也就是說，武力對抗的雙方做到同意聖誕節停火，而且必須在指揮官下令後才可以再度進攻等等。如果了解到他的這些背景，那麼，對於他為什麼對一九四七年在台灣所目睹之事會那麼地反感與痛心，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從台灣返家途中，先父還曾經路過澳大利亞雪梨做了一次短波廣播，向外界公布台灣在(魏)道明「革新政府」治理下的情況。喬治·柯爾在「被出賣的台灣」一書里寫到：「由於這項廣播等於強烈的控訴，而且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也收聽到了，因此激起國民黨政府歇斯底里般的瘋狂反應。程天放手下的宣傳人員對此回應的說法是，英美帝國主義其實和他們所對抗的納粹日本具有同樣的野心，只不過手段更高明罷了。他們說，美國和英國利用「聯合國救災及重建公署」的救濟物資為餌，表面上說是「援助中國」，實際上是陰謀企圖兼並，剝削和「奴役」台灣。」

「福爾摩沙的呼喚」並不是有關一九四七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的正式報告。先父並非職業作家，這本書也沒有得到專業編輯或這方面專家的協助。相反，這本書只是由一名職業工程師，教師，以及曾經一度是軍人的先父所撰寫。

先父在一九四八年完成這本書時曾經幾度嘗試出版，但是都沒有成功。他不認為這是因為本書的市場有限所致，他認為主要原因還是沒有出版商肯出版對「我們的國民黨中國盟友」如此批判的著作。

不過先父自己也承認他這本「福爾摩沙的呼喚」在圖書種類上很難歸類。有一度這本書曾經被歸類為私人手記，是一本比較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和國民黨中國統治下不同景況的敘述，同時也是一本政論集。

作為私人手記，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先父個人的興趣躍然紙上。舉例來說，這本書里有很多地方提到鐵路，工廠，橋梁，學校和大學，甚至有一個單獨篇章專門提到台灣的基督教，當然了，所有這些都是他由衷關切之事。

當比較日本政府和國民黨中國政府在台灣的統治時，先父偏愛日本的心理也顯而易見。雖然這對才和盟軍並肩作戰的國民黨中國以及終於被揭露的日本暴行來說似乎有點不合理，但他比較的重點倒是雙重的。一方面他指出了日本統治給台灣帶來的工業和農業發展，一方面他則指出台灣人權在兩個政權統治下相對來說的不同程度。先父認為，雖然日本統治非常嚴厲，但是比起他一九四七年在台灣所目睹赤裸裸的暴力和貪污，他認為日本的統治不但公平而且還可以接受。

站在聯合國派駐台灣的一名官員的立場，先父對台灣民眾福祉的關心超過了對全球戰略形勢的關切，也因此故，他的有些政治評估顯然是有問題的。

舉例來說，他對蘇聯共產主義會吞沒中國的共產主義，已經被歷史事實證明是錯誤的。但是無論如何，先父畢竟忠實地寫下了一九四七年發生在台灣殘忍暴行，以及他個人對這件事的發生原因和對整個世界歷史影響的解釋。

卡林·詹姆士·謝克頓 威靈頓，紐西蘭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五日

譯者序

「二二八」——這個台灣歷史上最悲慘的事件，不但在所有台灣人心目中烙下無可磨滅的印記，而且也凸顯了當年國民黨腐朽政權與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已逐漸現代化的台灣的「格」不入。事實上，二二八事變此一慘案加之隨后而來的白色恐怖及長達三十八年的獨裁統治，恐怕正是使台灣人民決心追求獨立的原動力。而「二二八」自然也就成了這一原動力的象征。

本書作者艾倫·謝克頓先生為二次大戰后「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派駐台灣協助工業重建的紐西蘭籍官員，在台期間正好碰上這一段歷史公案，於是將個人所見

所聞私自記載下來，返國后整理成書，且滿懷感情的把書名叫做 [福爾摩沙的呼喚] (FORMOSA CALLING)。

可惜的是，謝克頓先生當時為了避免牽累仍在蔣氏統治下的無辜，致全書所敘事實幾無一姓名留下，使本書失色不少。但無論如何，在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刻意銷毀二二八史料，使二二八真相在五十多年后今天益發使人模糊的情況下，本書仍具有無比的意義。尤其作者書中所流露出對台灣民風(仆)實的激賞，對蔣介石國民黨政權蠻橫腐朽的憎惡，以今視昔，在我們紀念二二八時也許更足發人深省。

此所以當英文 [台灣公報] (TAIWAN COMMUNIQUE) 發行人韋杰理，陳美津夫婦要求我將這本書譯成漢文時，我不但欣然同意，而且懷著誠惶誠恐戒慎恐懼之心全力以赴，只希望能借此書進一步喚醒台灣人民的獨立意識和決心，進一步喚醒台灣人原有的誠實美德，廓清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所帶來的嚴重污染，建立一個像瑞士般山青水秀的文明國家。

其實若從間接角度，這難道不是我們對大陸祖先之地最有意義的回饋嗎？就好像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能夠在英國以外建立起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同文同種的民主進步國家，使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勢力磅礴(博)于五大洲三大洋太陽所及之處，這難道不是整個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最值得驕傲的榮耀嗎？

最后要指出的一點是，由於作者雖為優秀的工程師但卻非老練的文字工作者，行文敘事往往對人，事，時，地，物交代不夠清楚，加之年代已久，景況已非，有些地名甚至早已不復存在，因此我除了必須(鉅)盡腦汁從上下文和字里行間仔細推敲外，還必須做很多的詮釋和潤飾，並且把原著里過大的段落分成小段，每個章節里另外配上小標題，以利閱讀。但在原意的保留上，筆者並不敢做絲毫改動。讀者若有興趣對照文后的英文原著時，切不可逐字逐句對照，而須以整個段落為基礎。

人生有許多緣分與福氣，身為外省人子弟第一代台灣人的我能有幸翻譯謝克頓先生此書實為我畢生最大的緣分與福氣之一。在此由衷希望本書的出版能為這半個多世紀前的悲劇事件帶來更多正面意義。相信九泉之下的謝克頓先生也將無憾。

是為序。

宋亞伯 一九九八年六月

作者原序

最近幾年有關中國和中國人的出版品如此之多，使得出版界面臨了讀者大眾可能對這類出版物倒胃口的危險。因此，任何作者如果想再出這類題材新作的話，都必須有很好的理由。

而我相信我有很好的理由。

首先，這本書其實並非真正有關中國的著作，而是關於台灣的著作。而台灣這個島嶼可還不是中國合法的一部分。

作為二次大戰後一個 [外來占領的強權]，中國人的一些作為引起了許多重要問題。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至少對太平洋地區和平而言，台灣有可能成為一個非常麻煩的危險地點。

引導我得出這項結論的事實對整個世界來說可能並不知情。部分原因是許多人刻意努力去遮掩這些事實。身為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在台灣的一名工業重建官員，不論從地區性角度還是從國際性角度出發，我總是對台灣的危險情況不斷關注。而且自我從中國回來以後，我聽到的許多傳聞更堅定了我的信念，那就是，為了和平，公義和人道，台灣的這些情況都必須努力設法廣為人知。

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親身經歷使我得到這樣的結論，那就是，儘管宣傳說得再好，但戰爭不會帶給世界和平。在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任職期間，我看到了我以為可以為大戰結束做出我個人一點小貢獻的機會。此外，懷著仍然為和平工作的想法也促使我撰寫這本著作。

除了第一章大部分以外，本書的素材不是我個人的親身經歷就是那些人品毋庸置疑者的報導。有些報導我甚至還親自加以求証過。不過無論如何，由於還是存在著我的許多台灣朋友可能因為我這本書遭到迫害的危險，我不得不避免使用真名。但我個人的確保留了正確的真實姓名和日期。

還有一種危險是，對那些心里頭對人對事只有幾種標籤的人而言，他們很可能會錯誤地把我歸類為 [反華分子]。我有許多中國朋友和熟識，對這些人我是由衷尊敬的。事實上，中國人今日所生活的社會體系是如此叫人反感，許許多多中國人慶惡他們的社會體系就如我一樣的強烈。他們自己也知道，在這種社會體系完全或部分改變以前，他們的國家是不可能成為一偉大國家的。

但是現在，我並不敢確定我所寫的這本書究竟是一本普通的旅游書籍還是一本政治性書籍。不過無論如何，我希望旅游性質也好政治性質也好都能引起廣大讀者足夠的興趣。當然我更希望讀者在讀過本書后會同意我的結論。

目錄

第一章 福爾摩沙 --- 美麗的島嶼

第二章 大陸人的到來

第三章 東海岸

第四章 中國人試圖重建

第五章 財政和一般經濟狀況

第六章 澎湖的故事

第七章 導致抗暴的事件

第八章 陷入暴亂

第九章 抗暴的最后階段

第十章 余波

第十一章 誰的罪責？

第十二章 新政

第十三章 基督教的影響

第十四章 前景何在？

第一章 福爾摩沙 --- 美麗的島嶼

在不同的時期，許多國家 --- 包括中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美國，法國和日本，都對台灣產生過興趣。

十七世紀中葉時，荷蘭曾經統治台灣達三十八年之久。他們當時在安平和台南的殖民地，現在已成了荷蘭人 領台灣時的紀念物。西班牙人曾經在台灣北部的淡水和基隆殖民。至於葡萄牙人對台灣的貢獻，則是給台灣這個島嶼起了一個最廣為西方人所熟知的名字 --- [福爾摩沙] (FORMOSA)。葡萄牙人當時稱台灣為 [ILHA FORMOSA]，意思是 [啊！美麗之島]。不過無論如何，這個島嶼也以它的中文名字 [台灣] 為世人所熟知。

一六八三年時，這個島嶼正式成為滿清中國的一部分，隸屬於福建省政府管轄。自此以後就不斷有中國移民從福建廣東兩省渡海前來，迫使台灣當地的原住民退往人跡難至的高山地區。

在整個十八世紀，有關台灣的記錄似乎寥寥無幾。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我們發現，西方國家和日本都爭相奪取這個島嶼的利權。因為這裡似乎包含了很多可能性。

在一八七〇年代，日本藉口當時還有獵人頭習俗的原住民殺害了因為船支被風吹翻而漂流至台灣的日本漁民，派遣了一個遠征軍強行登陸台灣。但是隨後不久由於英國和美國的反對，日本這支遠征軍乃不得不撤出台灣。

成為日本的一部分 ***

一八八一年時，法國封鎖了台灣幾個月之久。隨後，日本(計偷)台灣的機會再度因和中國就朝鮮問題發生爭執而來臨。最後，這個島嶼終於在一八九五年因為一項結束中國和日本戰爭的馬關條約而被正式割讓給日本。

不過，台灣當地居民卻拒絕承認中國政府的這項割讓。他們自行宣布成立 [台灣民主國]。在日本正式占領台灣前，這個 [台灣民主國] 存在了六個月之久。至于日本徹底征服台灣的原住民，則是到二次大戰前不久才完成的事。

台灣原住民之所以能得到這樣的成功，主要是由於縱貫這個島嶼的山地是如此險峻陡峭，其中有些山峰高達大約一萬三千英尺。這個島嶼南北最長距離大約兩百五十英里，東西最寬大約九十英里，面積大約一萬四千平方英里，島上居民大

約有六百五十萬人。台灣山地主要分布在東海岸地區，西部地區的地形則相對平坦，這就使得種植稻米所需要的灌溉容易實施。河川水流湍急，往往在(台)風季節造成災害。

台灣這個島嶼有令人驚異的肥沃土壤和充沛的雨量。北部主要港口基隆據說是全世界雨量最多的港口之一。此外這個島嶼還蘊藏了許多天然資源像煤炭，石灰石，木材，(夕)土，硫磺，鹽，石棉，以及出產原油和天然氣的油田。

日本人在他們的五十年統治期間，在台灣島上建立了彼此緊密相連的工業。舉例來說，日本人在台灣建立了肥料工業（但制造肥料的磷酸鹽礦則必須進口），不但大大增加了農作物產量，而且使稻米能夠一年收成兩次。日本人也增加了台灣的甘蔗種植，而甘蔗則是台灣每年一千七百萬噸龐大蔗糖工業的基本原料。

其他有關的生產商也對肥料和其他工業生產作出了他們的貢獻。其中像：從硫磺里提煉硫酸，從空氣里提煉氮，利用廉價電力從煤炭和石灰石提煉碳化鈣等等。總而言之，日本人準許台灣人參與私營工業的投資和經營，這就促成了一個富裕而且有教養的階層在台灣興起。

為了協助工業發展當然得建立良好的通訊系統，其中包括鐵路（長距離的雙軌）和路面堅實的公路。三個主要港口分別在北部的基隆，南部的高雄和東部的花蓮修建。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港口大部分是人工修建的人工港。至於在西部興建的一處港口則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而中斷。（譯者注：即台中港）

除此以外，日本人還挖掘了一條五英里長的運河連接台南市中心到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還為了木材工業而修建阿里山登山鐵路。這條鐵路沿著峭壁，跨過山(古)，幾乎以 S 型的軌跡在五十英里長的軌道上，迅速盤升到九千英尺高度。

電力的供應豐富又便宜，因為這些電力主要是從水力發電而來。這些電力以一百四十千瓦的電壓供應整個島嶼。此外台灣還有豐富的煤炭可供火力發電所需。

台灣之美 ***

葡萄牙人曾經如此貼切地稱呼這個島嶼為 [美麗之島] (FORMOSA)，因為這個島的天然景色實在太美了。從首都台北搭火車到兩百多英里以南的高雄，沿途盡是綿延不絕的瑰麗鄉村，紅色的磚房點綴在綠絨般的稻田上，偶爾也會有崎嶇的高山和湍急的河川等壯麗景觀出現在眼簾。

這個島也擁有許多溫泉，日本人將之開發成一些美麗的假日休閒勝地。其中最

名的要算是台北北方的草山(即陽明山)和北投了。甚至在台北和基隆間二十英里長的寬闊混凝土路面上開車，你也會發現兩旁的景色是如此優美，叫人著迷。由於北回歸線橫貫這個島的中部地區，因此台灣的氣候基本上屬於溫暖或溫和。當然了，這部分也由於台灣四面環海使得極端氣溫不可能形成的緣故。

島上城鎮也分布的恰到好處，而且都經過良好規劃。比較重要的建築都是鋼骨水泥或磚造的，樓房的二層以上通常都凸出來成為騎樓，以遮蔽樓底下的人行道，使行人得以在其下遮陽蔽雨。不過后來的中國當局準許騎樓底下的人行道成為腳踏車和汽車的停放地或攤販的聚集地。

日本式住宅興建在每一個城鎮的特別地區。日本式住宅設有門窗與牆共用可以左右滑動的外壁，這樣的外壁和內間也可以左右滑動的牆壁之間則往往是走道。這種格局使內間在需要時可以直抵外壁而變得寬敞，而且內間在夏天時由於多了一層走道可以產生隔熱效果變得十分涼爽。雖然這種格局在冬天時會有太通風，寒冷且潮濕的缺點，但由於這種天氣在台灣為時甚短，因此顯然抵不過在每年炎熱夏季里所帶來的優點。再說，冬天時還可以在房子中間升起碳火煮火鍋或火盆來增加房子的溫度。

日本人的傳統習俗是在進屋前將鞋子脫在入口玄關處，然後換上拖鞋進屋。房間的地板上則用榻榻米鋪起來。所謂榻榻米是用稻草梗子編織成的長方型厚墊子，具有保溫且減少噪音的作用。至於房間地板則都是木制的。榻榻米的規格是固定的，都是一公尺寬兩公尺長，至於房間大小則由榻榻米鋪設的數目來決定。換句話說，所有房間都一定建得剛好可以放下一定數目的榻榻米。

根據日本人的傳統習俗，晚上只要把墊被和棉被放在房間的榻榻米上，這個房間就成了臥室。此外他們也用(文)帳。至於白天時的家具則僅僅包括了一個低矮的桌子，以及放在桌子邊的座墊。

[肥肉] 到口 ***

日本人花了很大氣力清除台灣島上的疾疫，並且教育島上的人養成清潔衛生的習慣。由於習慣培養的如此徹底，因此當中國人接收台灣後容許街道變得如此骯臟，委實令台灣人感到驚訝。同樣地，經由嚴刑峻法，日本人也把台灣人訓練得非常誠實，甚至似乎終於變成台灣人個性的一部分。

台灣島在二次大戰後期遭到盟軍轟炸，受到嚴重損壞。然而在戰後的現在，它卻和滿州里(即中國東北)一樣，成為中國最具生產力和最工業化的地區。[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 在中國設立辦事處來協助救災和重建工作。[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 是按照和中國政府的協議進行救災和重建工作的。中國政府則相應成立了一個

叫做「中華全國救災及重建署」的機構。

按照這項協議，所有「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物資一旦在中國港口上岸，就都屬於「中華全國救災及重建署」的資產。「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只保留監督這些物資是否真正到達原定目的地的權利。至於這些物資如何分發則是由「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和「中華全國救災及重建署」共同做出決定。

一般來說，每一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官員都在「中華全國救災及重建署」里有一名相應的中國官員。這也就是說，「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和「中華全國救災及重建署」同時都擁有一名工業重建官員，一名農業重建官員，一名醫療衛生官員，等等。

但是，當具體項目進入細節時，「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和「中華全國救災及重建署」的觀點和目標不一致了。雖然私人的表面關係看起來像是非常友好，但工作上的關係有時候則相當緊張。

日本留下的資產顯然已成為中國人豐厚的戰利品，在下面的章節里，我們將敘述中國古老的習俗是如何來利用現代化日本的工業成果。

第二章 大陸人的到來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灣人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后，迫不及待地想和他們的祖國再度合而為一。他們對中國領導人蔣介石萬分崇敬，而且相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會帶給他們和平，繁榮與幸福。

事實上，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台灣人已經得到良好的生活水平，而且法律嚴格的範圍以內，台灣人也可以安全的生活。因此他們想象著，隨著大陸同胞的到來，他們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一定會進一步改善。因此之故，當大陸人前來接收台灣時，的確受到台灣人揮舞著中國國旗興高采烈地歡迎。然而，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多久。

前來接收台灣的國民黨軍人在迅速建立起簡陋的營舍后，立刻開始有系統的搶劫和強姦。舉例來說，在北投，街道上的女孩子往往被施以麻醉劑后帶往軍營讓軍人發泄，然后再用船送往大陸。其中一名比較聰明的女孩在騙取俘虜她的人的信任后，利用間隙翻牆逃到父親那兒，她的父親向警察求救。然而警察現在已經

是大陸人擔任了。這些警察對憲兵十分懼怕，因此當然對這件事置之不理。

台灣人不久也發現，只要國民黨軍人一出現，他們的財產就可能不保。法律對軍人的搶劫行為也沒有任何矯正或補救的條文。事實上，國民黨憲兵自己就忙著從事更大規模的劫掠。雖然國民黨政府官員聲稱日本人留下的財產是屬於政府的，但有些憲兵軍官顯然對這些財產更垂涎欲滴。

舉例來說，有一家工廠老板為了生意離家外出，國民黨憲兵就趁此要他的兒子向警察局報告，但警方卻立刻將他逮捕下獄。同時聲稱這家工廠曾經為日本人提供設備和原料，因此其產品是屬於日本人的，現在當然也就屬於中國政府。不過他們同時也表示，只要肯付出三萬塊錢，就可以釋放他的兒子，這個案子也可以撤銷。

當這家工廠老板三天后回家時得知這件事，立刻向國民黨憲兵質問他的兒子犯了什麼法。在聽到這樣的指控后，該工廠老板除了承認被迫生產產品給日本以外，否認曾經協助過日本人。他並且表示將不惜聘請律師把這個案子上訴到最高法院。國民黨憲兵這才發現如此一來可能使他們自己卷入麻煩，於是倒過來央求希望不要公開這件事，甚至把孩子母親已經交出的三萬元也趕快退還，這件事才算落幕。

走了日本狗，來了中國豬 ***

還有一些報導說，國民黨軍人拿出成箱看起來像官方文件的東西，聲稱是企業家的股票因此也就是日本人財產，但為了表示體恤，他們願意假裝沒有看見這些東西。但是經仔細檢查后發現，這些文件根本沒有蓋上官府印記，倒是這些國民黨軍人在上面蓋上了自己圖章。由於情況變得如此惡劣，使得這些失望的台灣人咬牙切齒的說：「走了日本狗，來了中國豬。」

但總的來說，台灣人並沒有因國民黨政府這樣肆無忌憚的做法而氣餒。例如，擔任高雄市長的大陸人把從日本手上接收過來的稻米和水泥悉數盜賣，然后把錢放進私人腰包。當地報紙形容這簡直是「赤裸裸的榨取」，使得這位市長不得不立刻返回上海。國民黨中國政府也發表聲明，表示將組織一個調查委員會來專門調查此事。

但所有台灣人希望能公正交代這件事的願望最后都歸破滅。因為一個月后國民黨政府宣布，調查委員會沒有發現此人犯有任何罪行。但是在高雄，可沒有人認為調查委員會有任何證據可以做出這樣決定。因為凡是可以提供證據的高雄當地人，沒有一個獲準出席這個委員會。而且這個問題其實才剛剛開始，因為幾個月后，這位高雄的「前市長」又被國民黨政府派來成為國民黨在台軍隊的一名參

謀長。

在國民黨文人官員負責的工業領域，已經被日本人訓練得習慣以誠實交易的台灣人發現，即使他們僱用了大陸人屬下，他們的處境也非常困難。有一家工廠的台灣人老板發現他的大陸人屬下從事一個利潤非常豐厚的監守自盜的勾當。作法是偽稱為不同顧客提供產品，但實際上這些產品中只有一部分真正提供給顧客，其余都私自在黑市里賣掉，中飽私囊。

在最后將他的大陸人屬下扭送警方以前，這位台灣商人做了周詳調查。此期間，這名大陸人則用盡各種辦法，從把贓款給他分紅到威脅暗殺等等，希望說服放他一馬。而就在調查完成，表明這件事很明白就是一項監守自盜行為后，這位台灣商人發現自己也被警方逮捕了，原因是：[縱容] 手下從事這種勾當。

更有甚者，這名被告為了避免被警方逮捕，給了警方三十萬元賄款。這三十萬換來的是，這名大陸人被告得以住進風景優美甚至可以說豪華的牢房里去。相反的，這位台灣人老板則被關進同時也關著強盜和小偷的土牢里。土牢里到處是蚊蟲和虱子，不但陰暗骯髒，而且臭味撲鼻。這個牢房的面積只有十二英尺見方，但是卻擠進了十三名犯人。牢房的一半鋪有地板供犯人睡覺，另一半則只有骯髒的水泥地。

國民黨當局給予這位台灣人老板強大的壓力希望他撤銷這個案子，但是他不為所動。由於這名大陸人被告盜賣所得的贓款高達一千萬元 --- 也就是相當於十萬美元，所以他可以很輕易地進行賄賂，而法院里的大陸人官員當然也就堅決誣陷這名台灣人了。

國民黨政府官員告訴這個台灣人老板說，他會被拘押在看守所里兩個月才接受審判。到了兩個月末了，檢察官會因為缺乏證據而要求延期。如此一來，他就得在看守所里再待上兩個月。之后就必須舉行審判了。

[紅包] 是唯一的護身符 ***

在這拖延的四個月期間，國民黨當局希望民眾對這件案子的興趣會自動消失，則檢察官就可以趁機宣布證據不足不予起訴，被告也就自然獲釋了。這是當被告[紅包] 給的充分時，國民黨政府司法官員通常使用的一個辦法。

但是無論如何，這個辦法被當時台灣爆發的抗暴事件給打亂了。這名台灣人老板以及包括大陸人被告在內的其他犯人，統統被抗暴民眾給釋放了。被告于是逃回大陸。此后他的下落沒人知道。但是，這名台灣人老板由於不是被警方釋放的，因此在往后九個月里，他都得擔心是否會再度被捕。事實上，只要局面續維持這

個樣子，這名台灣人老板似乎就永遠無法從危險里脫身。

至于究竟有多少警察機構在這個島上獨立作業，各方說法不一。許多政府部門都擁有自己的警察，有公開的，有秘密的，但是全都有武裝。我所知道的就有四種：軍事警察(憲兵)，普通警察，法院警察(法警)和海關警察。這些警察機構之下似乎還設有幾個附屬機構，每個機構都可以獨立作業，而且彼此間的權責義務並沒有明確規定。

所有這些警察都可以逮捕平民，台灣人不久就發現，他們如果不想身陷(玲與)，就得不斷給各種不同的警察 [送紅包]。因為只要一種警察得了好處，另外一種警察馬上會跟進制造藉口。

這些警察不需要去証明他們的藉口。在提出藉口時，他們的態度也沒有像暴亂發生后那段時間那麼嚴厲。有時候，不同的警察機構也會發生爭執。這對國民黨政府的警察來說並不是罕見之事。其中最有名的一次這類事件發生在上海的 [金門戲院]。在那里，由於警方內部不和引起的糾紛，國民黨憲兵當場槍殺了幾名普通警察。

另外一件台灣人受到警察 [保護] 的例子也許也值得一提。這件事發生在台灣南部的一家醫院里，當時醫院里的護士宿舍遭到顯然知道內情者的偷竊。院方於是找來了警察調查，警察當然也發現了是誰犯下這個案子，但是，在收到 [紅包] 以前，警察拒絕採取行動。由於護士的收入微薄負擔不起這樣的 [紅包]，因此警察自然也就置之不理，護士們被盜竊的損失也只有平白損失了。

即使擁有全世界最好的意志力，台灣人也發現他們處境艱難。這裡再舉一個例子：一位國民黨政府官員造訪一名米商，要他填寫一張表格，寫明他還貯存了多少米。他如實照填了 [六百五十包]。由於沒有指示不準他出售這些米，而且所有報紙也一再呼吁大家不要囤積，於是他在一個星期內出售了所有這些米糧。但之后卻有一名警察前來要他交出他的存米。當他回答說他根據報上的官方指示已經把所有米糧都出售了，這名警察立刻將他帶走並且下獄。

幸虧他的一位認識檢察官的朋友向警方解釋了這個案子並且求情，這名米商才終於在 [保釋] 的條件下獲釋。但是據我所知，這個案子可從頭到尾沒有審判過一次。

連門窗都搶 ***

在台灣的日本平民(包括技術人員) 都被國民黨政府盡快用船遣返日本。國民黨政府準許他們在離境時攜帶一百公斤的衣物和私人用品以及少量金錢。他們留

在台灣的其他財產則交由「日人財產處置委員會」控管。

許多地方我們都經常可以看到日本人原來居住的房子空蕩蕩地豎立在那里。所有搬得動或搬不動的東西都被搬走，其中包括水管，抽水馬桶，水表，窗子，門把，以及所有可以變賣的東西，在許多情形下，甚至還包括了地板和天花板。這種現象尤其是在國民黨士兵進住這些民宅的時候最為明顯。

曾經有一度這類物資穩定的流向中國大陸，而當時台灣人要得到出口許可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很顯然，這種勾當當然是大陸人干的。

還有一次，某一位重要的台灣醫生向「日人財產處置委員會」承租了一棟房子，他在繳交了租金之後搬進去住。但是中國占領軍第九十五軍的兩名軍官卻前來這位台灣人的住處，用左輪槍脅迫他滾蛋。目的是他們自己要搬進來。

之後這兩名軍官把兩名女孩帶進屋子，其中一名女孩的哥哥要求醫生幫他救出他的妹妹，他表示其中一名軍官把他的妹妹帶進這棟房子強姦。但是當這位醫生向這名軍官做此要求時，卻換來射殺的威脅。

這兩名軍官在這裡待了一年，這期間，女孩生了孩子。而當他們離開時，這棟房子已被劫掠一空，所有能移動或可以拔走的都被變賣。房子里不但沒有家具，甚至沒有窗子，沒有門，沒有燈，沒有水管，除了一座空殼子，什麼都沒有了。也沒有人知道女孩們的下落，連事後修理房舍的費用還得由這位台灣人醫生自己掏腰包支付。

擺明的雙重標 ***

不過儘管經常處在巨大的危險之中，台灣人還是穩步地繼續維護他們在法律上應有的權利。台灣人表示，儘管日本殖民政府統治嚴厲，但是法律卻有明確的定義而且得到切實執行，這使得他們能夠在法律範圍內和平，安全而且舒適地經營生意。此外台灣人也發現日本人做生意的態度是誠實的。

但是當大陸人來了以後，一名台灣人形容說，除了賄賂以外，根本沒有法律。賄賂成了不至坐牢的唯一辦法。甚至只要能夠不斷地賄賂，賄賂還成了成功的唯一辦法。在生意往來上，台灣人發現他們經常受制於很容易被大眾忽略的一些瑣細規定。但是這些規定卻確實存在，國民黨政府的警察發現，只要提醒台灣人違反了這些規定，就非常有利可圖。也許我可以用一個活生生例子來解釋這種現象。那就是，穿著日本式木(肌)是不合法的。由於這在日本時代是很普遍的穿著，所以一下子要大眾立刻改變這個習慣幾乎是不可能的。購買，出售或播放日本歌曲也是犯法的。另外還有一些瑣碎規定，像在餐廳里跳舞是不合法的。因為這不符

國民黨當局的節約運動。但是另一方面，酒家里的酒綠燈紅和紙醉金迷卻又生意鼎盛，不受打擾。國民黨政府這種幼稚的作法除了遭到台灣人輕視，嚴重(杆)擾台灣人的日常生活外，實在一點好處也沒有。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灣人在街頭對著躲藏起來的大陸人大聲播放日本軍歌，但是已沒有警察(杆)涉了。凡此種種，都是台灣人在戰后受到中國人卑鄙對待的一些例子而已。這些做法，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最后終於促成了二二八事件爆發。

第三章 東海岸

台灣許多地方的荒野和險峻，對日本人修建鐵公路系統的工程技術曾經是一項嚴厲考驗。而且即使最后修建成功，暴雨和(台)風的侵襲也使得必須經常維修才能夠維持暢通。人類對大自然抗爭的困難，可能很少有像台灣東海岸那麼凸出明顯了。

台灣的鐵路經常是通過群山峻嶺，到達一處狹小肥沃的平原，然後進入更險阻的群山峻嶺。但是在大部分路段，台灣的鐵路則避開了台灣的脊梁 --- 插入雲霄的中央山脈。在基隆往蘇澳的路段上，沿路有中央山脈的支脈不時攔阻，直到濱臨太平洋岸聳入雲霄高達六千英尺的懸崖斷壁為止。這裏的懸崖斷壁曾經被形容為「世界最高而且最壯觀的海岸峭壁」。很顯然，在這樣的峭壁邊修建鐵路可不那麼容易。當然了，如果經濟上的回饋值得，修建鐵路也還是可能的，可惜蘇澳以南的花蓮，資源並不豐盛。

蘇澳本身是一個無以名狀的狹小漁村，瑟縮在高山腳下。但是這裏倒還真有一座港口。可是由於港口遠離蘇澳，而鐵路如果要連接蘇澳和這座港口的話，又得一連串的架橋與挖鑿山洞，換句話說，鐵路雖然可以抵達蘇澳，卻無法抵達這個小小的蘇澳港。鐵路顯然是為了當地民眾和水泥工業的需要而修建。

但即使是水泥工業，當我見到時也是一片蕭條景象。到處看到的機器都曝露在本該有廠房遮蔽的土地上，任憑風吹雨打。看起來好像和一般的建廠程序相反，這裏是先裝好了機器，才準備在機器四周修建廠房一樣。然而事實卻是，一場(台)風把所有工廠的屋頂和圍牆都吹得無影無蹤。

蘇澳本身的景色並不迷人。有些店鋪是磚造的，比起許多日本式住宅而言，這裏大多數是簡陋的木屋。我們離開火車站穿過地面崎嶇不平的廣場后，導游帶領我們穿過一條又一條的狹窄街道，直到我們遠離任何可以被稱作「中央」的地方，

進入一棟自稱[中央旅社]的房子。這里面包含了幾個所謂的[房間]和一條共用走道，走道的外牆也就是旅社的外牆。我們的[房間]在走道盡頭，房間里的地板是斜的，作為和另外一間房間間隔的木板，則根本沒有好好釘上。

只能吃香蕉 ***

然而這種情況似乎還嫌不夠讓我們沮喪，廁所的氣味夾雜著地板上塌塌米傳出的氣味，簡直讓我們窒息。一大群蒼蠅隨著晚餐一起被送來給我們，所以我們決定只吃其中的香蕉和米飯，因為米飯端進來時上面至少還加了蓋子。至于我們要求的香蕉，旅社老板則要我們另外先付錢給女孩去購買。我們的經驗是，那些表皮完整的香蕉在台灣應該是既安全又可以吃飽的食物。

當旅社服務員拿墊被和(文)帳給我們睡覺用時，我們的行李就幾乎沒有放置的空間了。懷著希望我們的嗅覺很快就會對這些氣味麻木的願望，我們躺下來準備入睡。但是其他旅客在松散地板上走過所發出的噪音，使用廁所時的開門關門聲，使得我們直到所有人都安靜下來以後，才可能入睡。

第二天我們必須一早起身。因為雖然極端險峻的地形阻止了日本人進一步往東海岸修建鐵路，但他們畢竟還是成功地在海岸邊的懸崖絕壁上鑿出了一條單向公路，往南直通二十五英里外的花連平原。而我們正是要經由這條路前往那里。

另外也有經由海上的聯系。在蘇澳和花連之間有一艘五十噸的船往來航行，但有時候必須等到這艘船載滿貨物才開航。當然了，在(台)風季節時，(台)風也會使得這艘船航行更不定期。

當我們抵達巴士車站時，發現一列幾乎全新的巴士正在等候。在時鐘敲響八點半時，這列巴士立刻以每輛車間隔大約一百碼的距離順序出發。在很短的距離內路面還相當平坦，但是不久巴士就開始盤升，路面也迅速變成只有一輛巴士的寬度。

由於幾個小時前才下過雨，行駛在這叢山間又濕鹿的狹窄道路上，實在不是什麼愉快之事。但我們也發現，在任何濕鹿滑溜的路段，兩旁就一定有鋼骨水泥護欄，以防止車子滑出去。

嘆為觀止的蘇花公路 ***

車行大約半個小時左右，我們開始爬升到非常陡峭的山區路段，沿路也開始出現黑色的分道線，這就是告訴我們即將進入更險峻的路段了。但無論如何路況並沒有因此一下子改變，只是穩定上升。最后，車子轉了個彎，好像這條路一下子到了懸崖絕壁的盡頭，而我們也好像要馬上就要直接從懸崖斷壁上墜落到千尺下

的海里一樣。

但是到接近時，道路向右急轉，不久我們就沿著從海岸邊斷壁上開鑿出來的路面前進，路的頂上仍然是懸崖斷壁。由於開鑿這種道路工程艱巨，使得路面自然盡可能狹窄以策安全。有時候甚至變成一連串狹小的山洞隧道。我的同伴提醒我說：「日本人對安全的概念顯然比我們對安全的概念來得。」

但是我仍然對靠海那一側的路邊鋪上一排低矮的水泥護欄感到放心，直到在路的一個轉角處我看到這種護欄破損。我猜想，這是因為巴士沒法在這個急轉彎路面有效轉彎，而水泥護欄又無法有效地阻擋偏離的巴士輪子所造成的。

沿路還不時遇到一些水流湍急的河川，使得道路必須在很短距離內拐彎抹角地下降，然後通過吊橋，再一步步開始盤升。在經過一處缺口時，我們發現這裡部分路面被滑落的岩石所阻隔。其中有些岩石大到把周圍小樹一起從險坡上滾落。我們的巴士只好在這些巨大的落石邊小心翼翼地繞過去。

但更糟糕的情況還在後面呢。當我們沿著另一段從峭壁間開鑿出來的道路前進時，車子忽然停下來，原來，前面的路面完全消失，滾落海里去了。新的連接道路雖然已經鑿出，但是窄到只可以供人徒步通過。我們只好帶著自己的行李，小心翼翼地從這個便道上通過，然後再登上在路那一頭等候的巴士繼續前進。

當我們這一隊人馬安全通過這個人行便道坐在路邊等候巴士的時候，我心里在想，他們一定看到我們這些洋鬼子顛顛危危走過便道的窘相，還好我們沒有一個人當場滑倒，因此看起來還不至于太丟臉吧。

大約到中午時分，我們到達一處原住民村落停留吃飯。這個村落位於一處狹窄的河(古)里，前面是插入雲霄的大山。這個村落顯然也是一個「香蕉村」。這也就是說，這裡的食物和煮飯方式是如此原始，蒼蠅是如此多，所以我們決定還是吃香蕉比較來得安全。

再經過大約一個小時行程後，花蓮平原已經在望了。我曾經到過這個地方，而且留下非常有趣美好的回憶。儘管這裡自然景觀那麼荒野，但日本人的確曾經打算在這裡發展農業和工業。

日本的開發計劃 ***

電力是由附近河流築壩蓄水發電取得。由於水量充沛，加上河床坡度陡峭，可以說廉價的電力幾乎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而廉價的電力對鋁和鋁合金的生產至關重要，事實上日本人也已經為此在花蓮平原修建了工廠。

不過，由於台灣島並不生產鋁土，因此原材料必須從海外輸入。這就意味著必須興建足以配合這項大規模計劃的港口和交通設施。於是，一個足以同時容納三艘三千噸貨輪的人工港就被興建起來了。

日本人還在這裡為種植稻米，甘蔗和鳳梨而發展了灌溉系統。他們在東海岸修建了三個大規模的制糖工廠。雖然糖業公司有他們自己用來運輸甘蔗的輕便鐵路，但日本在台總督府還是在花蓮到台東之間修建了軌距寬兩尺六寸的輕便鐵路，供一般民眾使用。

由於了解到台灣東海岸的孤立性，我問一名工廠經理他是如何處理他的煤炭供應的。這位經理回答說：「我們完全不用煤。」由於我了解這裡的電力豐沛，因此我猜想這裡的工廠機器一定都是電動的，這裡的蒸氣也一定是由電力鍋爐取得的。所以我再問道：「呃，那麼你怎麼做呢？」

這名經理似乎有所不解的回答說：「我們用夏天洪水季節從山上沖下來的木頭。」

原來，懷著前瞻性的巧思，日本人當時設計了可以使用木頭做燃料的鍋爐。而這種被天然廢棄的木頭顯然完全足夠讓這些鍋爐永久使用。

但日本人顯然也低估了(台)風或冬季風暴所可能帶來的破壞。在我上一次前來花蓮時，我曾經目睹許多這類毀壞。在最近(台)風季節的兩次洪水里，山洪帶來了大量石塊，使得河床高度比一座發電廠出水口的高度還要高，這也就是說，水流不但沒有從發電廠流出去，反而倒流進發電廠，如果此時閘門沒有立刻關閉，整個發電廠就得淹水了。這次災害損失了一萬六千瓦的電力。

情況更驚人的是在其他河(古)上的另外兩座發電廠，也就是發電量五千千瓦的色水第二號發電廠和發電量八千千瓦的東門發電廠，這兩個電廠都由於河床大幅升高而無法繼續使用。而這兩座發電廠當初就修建在河床邊。

當我們造訪這個山(古)時，色水第二號發電廠已經幾乎被整個掩埋。只有廠房頂樓的一部分還露在碎石外。事實上，洪水期間這裡的河床已上升了約四十五英尺。這種現象也整個毀了東門發電廠。而東門發電廠所放出的水原來是供應給另外一座發電廠---初見發電廠使用的。

由於東門發電廠被毀，使得初見發電廠也就沒有進水可以運轉，連帶地再損失了兩千千瓦的發電量。不過，這整整三萬一千千瓦發電量的巨大損失最後卻因為煉鋁工業被盟軍完全炸毀而得到平衡。日本人最後決定放棄花蓮的煉鋁工業，轉

而決定用所有可資利用的原料來修復高雄的煉鋁工業。

花東縱(古)***

然而，日本人也並沒有被這裡驚人的天災威脅所嚇倒，他們還曾經試圖開發所有的東海岸地區，其中包括從花蓮平原往南和東海岸平行的貧脊的花東縱(古)。花東縱(古)的西邊是台灣島骨干的中央山脈，東邊則是和海岸平行且高度比較低的海岸山脈。一進入這個(古)地，從中央山脈里流出的湍急奔騰的河水就急忙找尋被海岸山脈所阻隔的出海口。就是在這樣的地形里，公路和輕便鐵路從花蓮沿著花東縱(古)南下。

日本人當初顯然預料到修建鐵路直接通過海岸邊河的口扇形石灘會有很大問題。因為扇形河口頂端的些微改變，在河流到達扇形河口的底邊時，距離就可能相差好幾英里。當然了，日本人也曾試圖利用築堤等各種工程來控制河水改道，但效果有限，河水仍然把花東縱(古)的部分地區(沖)刷成幾英里寬的(麗)石荒漠。

要在這樣的河川上架橋當然是極端艱巨的，但日本的鐵路工程師非常聰明的將橋梁架設在扇形(麗)石河口的頂端——也就是河水才剛出山之處。因此之故，小火車在行進遇到河流時就不得不盤旋而上到扇形(麗)石河口的頂端，跨越在那里架設的橋梁后，再急轉盤旋而下。

有一兩處地方，由於扇形(麗)石河口的河床上升的如此之高，使得鐵路必須修建在很高的橋上以防止洪水淹沒鐵路。我們也猜測究竟這種橋要高到什麼程度，才會使挖掘河底隧道變得比較(滑)算。

公路和糖廠小鐵路不得不在花東縱(古)以及更崎嶇的地面修建，而且當然也總是遭到洪水破壞。同樣的，這裡的灌溉系統也總是被暴雨損害。

當我到達花蓮時受到當地代表——市長以及包括發電廠工程師在內的主要政府官員迎接。火車站里布置了旗幟和盆栽，另外還挂起了用英文書寫的「歡迎謝克頓先生」布條。當我參觀發電廠時也受到同樣招待，也有「我們真誠歡迎謝克頓先生」之類的布條。

但最使我印象深刻的，卻是國民黨中國的台灣省政府對這個地區的欺壓。我被要求騰出一個下午和當地官員及工程師討論這個問題。在我下榻的旅館會客室里擠滿了各種人，他們都盤腿坐在榻榻米上，對這個地區的未來感到焦慮。

大概是一九四五年九月的某一天，在四十八小時里降下了一千兩百毫米的雨量。由於日本人興建的水利控制工程沒有辦法抵擋這麼龐大的雨量所造成的洪流，

這場暴雨造成了廣泛損失，發電廠不但受到河床上升的影象，連蓄水壩和疏洪道也遭到損害。鐵路和公路橋梁都被(沖)毀，許多農田也消失了，代之而來的是一大片(麗)石，至于灌溉系統當然也受到嚴重損害。

[台灣總督府] 和 [台灣省政府] ***

這可能是台灣東岸地區有史以來遭受最嚴重的自然災害，重建和復原工作極端困難。因為日本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已經被遣返，雖然他們的計劃仍然管用而且也打算再度使用這些計劃。事實上同樣的這些計劃已經使用了大約三十年，而且雖然每年暴雨都會帶來損失，但仍然遵循著同樣的設計方案。現在這些設計終於過時，而情況也証明這些設計再也無法滿足需要，實在應該修改了。但不幸的是，當地的工程師里並沒有足夠的工程技術。

更嚴重的可能還是所需要的龐大復建材料。其中光是修復一處堤防就需要兩萬五千六百包(每包重一百一十磅)水泥。另外三處工程則總共再需兩萬六千包水泥。換句話說也就是需要大約兩千六百噸水泥才能夠達成起碼的修復，而水泥可是很不容易取得的。

但是真正最大的困難其實還是資金。在日本統治時代，日本總督府會負責百分之八十因為天災引起的這類損失，其余百分之二十再由當地地方政府籌款。因為日本政府了解到，即使損害不那麼嚴重，當地地方政府也不可能負擔得起這些經費。但是現在，花蓮地方政府面臨了要修復比過去歷次災害都更嚴重的損害時，國民黨中國的台灣省政府卻一毛錢也沒有。

如果沒有補助，花蓮地方政府就必須仰賴原本就有限的資源，而原本有限的資源已經因為工廠，住宅，道路等等因為盟軍炸而增高的需求用罄。這也就是，現在只要一點輕微的水災，也會引起不成比例的損害。

這些問題我們稍后和國民黨中國的台灣省政府有關部門進行討論。其中包括鐵路局，工業及礦物局，以及農林廳等等。所有人都同意必須對這種現象做點改進。但是當我進一步想了解什麼時候開始著手做什麼事的時候，我才發現，國民黨當局已經在考慮如何放棄開發東岸的問題了。

我雖然沒有充分証據証明國民黨中國的台灣省政府已經執行了這種政策，但在我上一次訪問花蓮時我非常清楚的記得，有一座長大約一百英尺的美麗橋梁上面長滿了青草，已經被完全廢棄不用，原因是，橋兩旁的引道被洪水沖走了。與此同時，當地居民則必須依賴原始辦法，在河床上興建便道以便河水水位低的時候可以通行。但毫無疑問的，這種交通怎麼會是長久之計呢？

除此以外，在那個時候台灣東部地區當然還受到整個台灣經濟衰退的打擊。

第四章 中國人試圖重建

當國民黨接管台灣時也面臨了很大困難。台灣的工業已遭到盟軍有效的轟炸摧毀。許多城鎮的許多地區被炸毀，其(余)則大致保持原樣。被炸彈炸的坑坑窪窪的道路布滿了瓦(麗)，經常無法通行。任何有重要性的大型建築都被摧毀，其中包括醫院。鐵路被嚴重損毀，幾乎所有車站建築都受到或大或小的破壞，有的甚至整個被炸平。鐵路機車頭一直是盟軍空襲的主要目標，殘存下來的機車頭則(契)需修理和維護。此外，在政權轉移的空窗期，還發生了嚴重打劫現象。因此很顯然的，大量的重建工作必須進行，而且必須迅速進行。

工廠的摧毀導致了失業，除此之外，中國人的到來加上他們的親戚朋友以及從海外被遣返的大約十萬名台灣人，都再加深了失業危機。

中國本身正處在內戰前夕，中國的經濟也因此深受打擊，因此沒有資金來重建和恢復。事實上國民黨中國已經從台灣拿走了許多資金，就好像根本不知道台灣也需要戰后重建一樣。那些應該用來回復台灣工業和經濟生活的資金，卻被國民黨當局用來支持中國大陸搖搖欲墜的經濟系統。

趕走日本人 ***

更有甚者，中國人對日本的憎恨顯然超出了理性範圍，因此全速把日本人遣送回日本。這也使得中國人在台灣的工業上面臨巨大困難。

在過去，台灣所有工業和有關部門的主要職位都控制在日本人手裡，然而，雖然在企業主管和領導官員方面可以從中國大陸輕易找到同類人才，但在技術領域中國就沒法充分提供了。

從中國大陸來的工程師都是年輕能干的，但他們卻缺乏工業經濟重建並使之有效運轉所須的訓練和經驗。如果那些日本技術人員被保證可以在台灣得到合理的生活條件及合理的遣返，相信這些日本技術人員將很樂意承擔這項工作。然後，他們還可以順便在各自領域里訓練新來的中國技術人員，到一定時候，這些中國技術人員就可以負起全面責任了。

但相反的，這些被中國人做法給激怒的日本人摧毀了有用的記錄和器材，使得已經因為盟軍轟炸而陷入癱瘓的台灣工業更雪上加霜。于是乎，中國的技術人員就不得不面臨非常困難的工作。他們必須重新制作，有時候甚至必須重新設計他們非常外行機械。

舉例來說，在一座化學工廠里，化學工程師要設計並安裝精確的機械設備是非常困難的。中國工業訓練的最根本弱點是，大部分工程人員對實際操作和應用興趣缺缺。他們顯然是很好的紙上談兵工程師。我也曾經遇到過幾位例外，但這些人全都在英國接受過訓練。我特別記得一個例子是，負責台灣鐵路運輸的一位中國工程師，他在極端困難環境下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績，而他所說的英語就帶著牛津腔。

零部件 ***

另外一個很大困難是，國民黨當局不準台灣和日本進行貿易。因為台灣大部分的機械設備都是日本制造的，因此禁止和日本貿易就等於不可能從日本制造廠購買修理零部件，而要其他國家制造廠生產修理這些機器的零部件又幾乎同樣不可能。

我這裡再舉鐵路作為例子。新輪箍，鍋爐管線，西屋剎車等等當時都是急迫需要的零件，但由於無法取得這些供應，使得許多鐵路設備無法使用。但盡管如此，許多困難還是被臨時替代品給克服。例如我曾經見過從舊鍋爐拆下來的每節長不到十八英寸的管線，被全部焊接在一起使用。

電報和電話通訊也是難題。在台北，電話系統已完全自動化，所有電話纜線都埋設在地下。每個地下電纜的工人修理出入口都已經破損，隨後又遭到濕氣入侵的破壞。曾經是日本人控制的台灣工業現在則由國民黨中國人接手管理，而且盡可能由政府壟斷。台灣島由陳儀將軍指揮，而陳儀在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一年任福建省主席時就以貪污腐敗濫殺無辜聞名於世。除開他和蔣介石有特殊的私人關係外，陳儀能出任台灣行政長官顯然也因為他和某些日本陸軍有力派系具有長久的關係。這種關係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保持。

*** 致力展開政府壟斷 ***

陳儀在出任台灣行政長官后任命了他的公署成員，其中包括礦業和工業方面的負責人，財政金融方面的負責人，民政方面的負責人，交通運輸方面的負責人，鐵路方面的負責人，以及農業和森林方面的負責人。工礦部門的負責人統轄了下面這些工業：石油，煉鋁，金礦，銅礦，制糖，造船，發電，電氣設備制造，制城，水泥，造紙，肥料，煤礦(只有大型煤礦)，鋼鐵廠，油脂，紡織纖維，磁磚，玻璃，

化學制品(包括橡膠, 香料等), 印刷, 建築工程, 以及工業設備和原料供應。過去在日本統治下, 上述這些工業里有很大一部分私人資金是台灣人的投資。這些當然可以在新的管理之下繼續發揮工效。至于交通運輸方面的負責人掌管的項目則包括了汽車, 港務局, 交通運輸。農業和森林方面的負責人則處理有關農業生產, 家畜, 茶, 鳳梨, 漁業和木材生產。每一負責人都可以制訂自己的規章, 這些規章往往可以形成政府壟斷, 如果在某一特別的機構里還沒有做到政府壟斷, 他們就會設法使更多台灣人擁有的企業無法運作。幾乎任何一項企業經營都需要執照, 雖然也許不是所有執照都需要花錢繳費, 但如果你向有關官員送紅包, 自然也就可以避免 [不幸的延誤]。更有甚者, 國民黨中國在台當局還不準私人經營任何工業原料, 從銀行里也得不到任何貸款。所有進出口都必須經由 [貿易局] 或 [公賣局] 進行。貿易局控制了一些重要物資像工業原料, 棉花, 砂糖, 肥料, 汽車和煤炭。專賣局則控制了鹽, 煙草, 酒類, 火柴和樟腦之類的物資。這種刻意窒息私人企業的政策大大阻礙了台灣的重建。事實上, 私人企業比大型政府機構更有彈性而且通常也更經濟, 舉例來說, 有一些私人擁有的制造機械工具的工廠, 這種機械工具不但在台灣非常需要, 在全世界也供不應求, 然而許多這類機械工具卻遲遲無法完工, 原因是, 不但這些產品的原材料在世界市場上短缺, 而且所有這些原料也都拿去給政府所屬的工廠。

*** 水泥短缺 ***

水泥工業也存在類似情況。直到大約一九四七年八月以前, 私人工業根本得不到水泥分配。毫無疑問的, 雖然政府當局聲稱嚴格管制, 但事實上這種在台灣由政府壟斷且嚴格控制進口的物品, 仍然可以在黑市以三倍價格購買得到。而且即使在這種情況下, 有時候卻給予政府工程巨大配額。舉例來說, 有一次台灣最大水泥廠的一個半月全部產量就只分配給 [港務局], 數量是兩萬兩千噸, 而在日本時代分配最多水泥的記錄則是給海軍修建新港口之用, 數量也不過每月四五千噸。此外, 日本政府也總是把水泥基本上平均分配給私人 and 政府以應付他們的需求。由於工業的脫序, 失業也就成了嚴重問題。當然了,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 實在需要讓私人企業盡可能地維持運轉。事實上, 失業問題也是後來導致暴亂的因素之一。對於私人企業僱員減少的情況很難估計, 一般來說, 一家私人企業員工減少到原來的十分之一並非不平常之事。像一家原來經營幾家工廠僱用一千多名工人的公司, 在一九四七年時只剩下三十五名工人而且還苦苦掙扎, 公司屬下也只剩一家機械工具店。

但儘管有這些困難, 台灣工業界還是盡量利用台灣島現存的大量廢原料, 其中包括被擊沉的船支, 所有形式的廢鐵, 廢鋼和廢鋁。從沉船上取下的鋼板被切割成條, 加熱后制成鐵條和鐵線。廢鐵和廢鋼在電極式的小電爐里被熔化后, 用來鑄造。曾經有估計認為台灣有大約一百家小型工廠從事和鋁有關的工業, 每星期使

用大約三百噸的廢鋁,而這些廢鋁大部分是從廢鋁制品再熔化后取得的.

*** 死要錢 ***

國民黨政府總是要錢,由於政府本身的壟斷使得他們索價非常高,這就倒過來損害了他們控制的其他工業.日本人曾經在台灣發展了世界最廉價之一的供電系統.但是在國民黨統治下,台灣的電價卻非常昂貴.由於許多主要工業都得仰賴廉價電力,因此當然也就有必要改變這種價格才可能使某些工業繼續營運.國民黨政府壟斷的海路運輸收費也極昂貴.曾經有一度,從基隆用船運煤到高雄的價格,居然是用鐵路運輸的三倍.一般的正常情況當然應該是用船運輸的價格遠比鐵路運輸來得便宜.[台灣水泥公司]曾經嘗試把一千噸水泥運到上海.因為在上海一噸水泥已經賣到十萬元[中國國幣].然而,這些台灣水泥光是運費就需要六萬九千[中國國幣],此外還得再加上手續費和保險費.對於從中國大陸運送磷礦到台灣生產肥料,國民黨政府獨占的[中國航運公司]索價每噸三十二美元,但是當他們發現這種價格會扼殺在台灣生產肥料的計劃后,幾經磋商,才把價格降下到每噸四美元.煉鋁和水泥工業在美國專家的協助下恢復,在水泥工業方面,[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提供了價值一百四十萬美元的設備,並且在有關專家協助下迅速有效地完成了重建工作.木材工業受到和其他工業一樣的困擾.舉例來說,[台灣林務局]局長黃為言因為從管制的木材價格里收取紅包而下獄.木材的價格有兩種,一種是政府控制的價格,一種是市場價格.商人們付給黃為言每十立方英尺五百到一千圓,以換取他們可以以市場價格出售木材.這位林務局局長在東窗事發前,因此而收取的賄賂總額高達八千萬圓.

*** 假公濟私 ***

如果要說明國民黨政府如何扼殺所有私人木材公司,也許可以舉[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經驗作為例子.我們首先發現和私人木材業聯系困難,於是我們就在台灣所有重要報紙上刊登廣告,表明只要他們的需要合理,我們就可以提供伐木和鋸木設備.需要者可以向[聯合國救災重建署]提出申請.但我們發現,實際上根本沒有從報紙廣告得到消息而前來的申請,當暴亂不久發生后,國民黨當局更禁止任何人尋這條管道做任何進一步探尋.六個月后,我們終於和木材工業的許多私人公司聯系上.這些公司立刻表示他們需要所有這類工具,而當我們問他們為什麼不對我們在報紙上刊登的廣告做出回應提出申請時,他們回答說,他們曾經向[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詢問,但得到的答案是,能供應的設備非常少,而且由于政府當局更需要,所以他們大可不必浪費時間提出申請.最后由于[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強烈表示只有他們才對這些設備的分配擁有決定權,國民黨當局才對這件事一手.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結束以前,他們已經對台灣的私人木材工業做出了非常有用的貢獻.

*** 盲目破壞森林 ***

雖然國民黨政府大致遵循日本人在台灣森林地區建立起來的伐木控制系統，但是有明顯證據顯示，在那些容易到達的山區，伐起木來可是完全不按章法，一視同仁地砍伐。經常可以看到的一幅景象是，苦力們用肩膀顫顫巍巍地把新砍下來的木材從山上扛下來。為了水土保持減少山洪對灌溉系統的威脅，日本人曾經在伐過木的地方植樹，然而在那些日本人曾經植樹的地方，現在已有大片被翻動的土壤露出來，而且還有打算在上面種植農作物的痕跡。很顯然，現在只需要一兩場大雨，山坡上的土壤就會被沖光。而這對山下的稻田可是一件嚴重之事。換句話說，如果這樣的盲目濫伐繼續下去，台灣平原地區高產量的稻田就有變成荒地的危險。[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 的農業專家對此非常關切，而且再三希望台灣[林務局] 注意這點。台灣的農業狀況在國民黨中國人接管時在許多方面也變得混亂。台灣的主要農業活動是種植水稻。台灣水稻一年可以收穫兩次。由於對土壤的使用持續不斷，因此台灣的農田需要廣泛施肥。日本人深切了解這點，所以在台灣興建了幾座肥料工廠，甚至在戰爭結束時，還有一家肥料工廠仍在興建之中。但是無論如何在戰爭結束時，台灣已沒有化學肥料可資供應，最后的結果當然也就是稻米產量減少。[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 盡快的及時介入這個空檔，給台灣提供大量化學肥料，從而產生非常令人滿意的結果。這裡所謂令人非常滿意的結果是從增加稻米產量的角度而言。

*** 稻米之外 ***

日本人其實對台灣農業也實施了某種產量控制，規定農民必須生產某種作物，即使從農人的眼光認為這些作物無利可圖。甘蔗，[住] 麻和黃麻就是其中最顯著的例子。

種植甘蔗的利潤不如種植稻米，台灣的大部分農地又都適合這兩種農作物。因此，日本人要求種植一定數量的甘蔗，雖然這些甘蔗的價格能夠支付生產成本，但是所余的利潤卻非常有限。

當然了，日本人的想法是把蔗糖價格盡量壓低，其中一個理由是，如果蔗糖價格太高，台灣龐大的鳳梨罐頭工業就不可能維持這麼大的經濟價值，就不可能在世界市場占據這麼優勢的地位。

因此當日本人的控制解除后，台灣農人就不太種甘蔗，加上由於甘蔗需要十八個月時間才能成熟，所以對台灣那些已經存在的制糖工廠來說，原料供應就非常缺乏了。

在目前，大部分甘蔗生產由制糖工廠自己決定，獨立的農人更著重于稻米的生產，除此以外，化學肥料的短缺也對甘蔗生長造成了影響。

[住] 麻的種子從日本進口，由於種植 [住] 麻對農人來說並不是那麼[滑]算，日本人就使用強迫手段取得這種必須的農作物。更有甚者，[住] 麻雖然在台灣種植，但進一步的 [住] 麻加工則只在日本進行。

[住] 麻在兩期稻作之間生長的很好，台灣的氣候也似乎非常適合 [住] 麻的生長。但是無論如何，由于和日本停止貿易往來使得 [住] 麻種子缺貨，加上農人們擔心 [住] 麻會減少下一期稻作的生長，因此戰後台灣農人種植 [住] 麻的情形已大為減少。同樣情形也發生在黃麻上。黃麻在日本時代也是被迫種植的。

在日本統治時代，黃麻的種植面積為大約十八萬英畝，到一九四六年時，種植黃麻的面積只剩下八千四百英畝。黃麻的用途主要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拿來做粗布袋，一種是拿來做繩索。就這個層面來說，[住]麻和黃麻都適合做粗布袋，但是由于 [住] 麻已經非常短缺，因此為了生產足夠的黃麻布袋，就得完全砍下現有的黃麻而且還得立刻制作不可。

如果把黃麻砍下任其倒在田里，這種黃麻會變成所謂的 [嬰兒黃麻]，這種嬰兒黃麻只適合用來制作繩索。為了得到適合做粗布袋的黃麻就必須在黃麻一收成時立刻向農民購買，然而不幸的是，當時的黃麻工廠沒有錢購買，因此只好讓收割下來的黃麻躺在田里變成 [嬰兒黃麻] 了。

更有甚者，所有收割都必須在黃麻結子以前完成，那些留下來為了結子用的黃麻既不適合黃麻工廠生產粗布袋，甚至也不適合生產繩索。農人於是要求政府補助生長黃麻種子。當這些補助得不到時，自然沒有可為未來種植黃麻用的種子。連帶地，作為稻米和砂糖主要包裝材料的粗布袋當然也就嚴重短缺了。

稱霸世界的台灣鳳梨 ***

由于米價和糖價高昂，鳳梨工業也受到同樣打擊。實事上，鳳梨工業大部分已經停擺。台灣鳳梨曾經擁有的廣大市場已經喪失，上海現在成為台灣鳳梨的主要市場，但即使是上海也由于通貨膨脹的關係削減了購買力，使得對鳳梨的需求也跟著下降。

不過真正最主要的問題還是生產鳳梨罐頭所需的馬口鐵的供應和價格。即使供應不成問題，當時馬口鐵的成本占了鳳梨工廠生產成本的百分之六十，糖則占了百分之十。由于盟軍轟炸的關係，三分之一的鳳梨工廠被毀。但是就好象許多其

他工業一樣，鳳梨罐頭工廠里的機器事先都被拆遷到其他地點，因此受到損失很少，在重新裝置后已能繼續生產。

現在，由于鳳梨短缺，一家鳳梨工廠在一九四六年八月生產季結束時，生產了兩萬箱鳳梨罐頭。這個數量在戰前只需要兩天時間就可以完成。

日本人盡了很大努力希望台灣的燃料能夠自給自足，為此還興建了一些可以用蜜糖或番薯生產酒精的工廠。你經常會發現一間酒精工廠就比鄰在一家制糖工廠旁邊。

不過無論如何，在嘉義，[中國石油公司] 屬下一家大工廠也在日本人協助下生產丁醇，丙酮和一般酒精。[中國石油公司] 當時是屬於國民黨中國 [國家資源委員會] 的一個分支機構。

丁醇是用來生產辛烷值一百的揮發性汽油。很自然的，這類工廠曾經受到盟軍轟炸的特別注意，再加上火勢延燒，使百分九十的這類工廠都被摧毀。

在這種情況下，嘉義這個城鎮也受到打擊而且損害非常嚴重。這家工廠過去在完全生產的情況下僱用了三千二百名員工，但是在台灣主權易手后，這家工廠僱用的人數逐漸減少到大約一百三十人。因此嘉義這個城鎮的失業情況也就可想而知，周圍那些為了這家工廠生產番薯的農人自然也跟著連帶受罪，日子難過。因為這家工廠的規模原來是全遠東地區最大的，嘉義的五分之一人口靠它而生活。

國民黨中國當局對這家工廠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由於他們沒有資金，所以無法讓這座工廠有效營運，甚至連讓這座工廠殘存設備免於惡化的維修工作都辦不到。此外也有許多清理工作要做，許多經過清理的廢物事實上也可以出售給台灣其他工業使用。

等著瞧 ***

國民黨政府的這種 [等著瞧] 的政策激惱了嘉義鎮民，因為嘉義的另外一項主要工業---木材業因為短缺工具也深陷泥沼。嘉義人民致力於恢復他們被盟軍摧毀的房舍，但是大部分人僅能居住在用廢材料搭建的破爛房子里。很常見的現象是，全家人居住在連乳農都不認為適合乳牛居住的建築物里。但是國民黨當局對嘉義鎮民的困苦卻顯然無動於衷。

台灣在日本時代曾經擁有良好的煤礦業，但就像其他工業一樣，由於設備的耗損加上戰爭破壞，現在也一蹶不振。事實上，盟軍的轟炸只些微損害了台灣的煤礦業。但轟炸卻對煤礦造成了間接影響。因為轟炸嚴重破壞了電力供應，使得煤礦

抽水邦浦無法運作，最后造成煤礦積水。

戰爭期間由於對煤炭的需求越來越高，有些煤礦開始采用露天辦法開采。但不久就發現，積水的情況嚴重到邦浦根本無法處理的地步，使得露天開采也根本不可行。

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國民黨政府控制了所有大型煤礦，至於私人擁有的煤礦則在老舊的設備和日增的規章加上令人窒息的官僚作風下掙扎。再一次，[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 又碰上國民黨當局把 [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 提供的設備挪至政府擁有的煤礦，而致犧牲了私人煤礦。

當然這不是在公開情況下做出的。這一次，國民黨當局想方設法把設備的價格盡可能提高，提高到私人煤礦負擔不起的地步。至於政府煤礦購買這些設備則只不過國民黨政府機構和 [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 之間形式上的文書往來罷了。雖然 [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 花了好多時間希望維持合理的價格。

但是無論如何，還有比這種取消私人所有權更好的辦法，那就是，對於那些 (契) 需修理的煤礦遲遲不發許可，如此一來，新設備也就成了次要問題。有一度，煤炭必須經由政府機構才可以在市場出售，國民黨當局還成立了一個所謂的 [煤炭控制委員會]，其職責就是把煤炭分發給各種不同的消費者。但是盡管煤炭普遍短缺，這個委員會還是成立沒有多久就失去功能。表面的理由是 [沒錢運轉]，但真正了解內情的人指出，這個委員會曾經為收取賄款提供了絕佳機會。

因為私人煤礦必須以固定的低價將煤炭出售給國民黨政府機構，這就使效益差的煤礦經營不下去。特別是對那些必須購買新工具或新設備的私人煤礦來說，這些新工具或新設備的價格又遠遠高出舊有的價格。

管制出口 ***

不過，最厲害的招數還是對煤炭管制出口。在這種情況下，煤礦主必須將他的煤炭出售給一間政府機構，然後這間政府機構才最後把煤炭在上海市場出售。賣給政府的煤炭價格僅僅夠支付煤礦營運的費用，但是煤礦主得到國民黨政府當局保證，他們可以獲得出售利潤的百分之五十，他們也了解這些在上海市場出售的煤炭利潤的確很大。但煤礦主不知道這個國民黨在台政府的機構打算把煤炭出售給一間中央政府機構，也就是這個中央政府機構把這些煤炭在上海市場出售而賺取巨大利潤。

從技術層面說，這個台灣政府的機構把煤炭出售給中央政府的機構 沒有任何利潤。因此這些煤礦主發現，這個轉手買賣 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利潤，他們的

所有回饋 (包括幻想中的利潤), 僅僅只夠支付煤炭的成本而已。

金礦和銅礦也有同樣情形, 只是數量沒有這麼大罷了。一九四三年時日本人下令一處礦廠將工作人員裁減一半, 到一九四五年三月時, 更因為戰爭造成的缺乏而將整個礦廠關閉。一九四五年四月到七月, 有一千兩百噸的鐵路物資, 炸藥和電氣設備被軍事用途征用, 其他礦廠也遭到類似對待。

一間礦廠在一九四三年的時候僱用大約一萬人, 但是現在只僱用了大約一千人。幾千名失業礦工現在自行通過那些已經沒有使用的礦井進入礦場工作, 並且用步槍和機關槍保護他們自己。而據我所知, 警方也無力阻止這種現象。

由於台灣多山, 這個地區(譯注: 即金瓜石)的居民幾乎完全依靠金礦維生。因此這裡的窮困是不堪設想的, 這裡的父母殺死家人再自殺也時有所聞。換句話說, 這裡的情況已到了絕望地步, 對於一九四七年初爆發的暴亂只不過再添上高爆炸力的燃料而已。

第五章 財政和一般經濟狀況

我在第一次訪問台灣時曾經得出結論認為, 重建的最大困難在於財政。國民黨當局一再告訴我沒有資金, 于是乎, 像台灣這樣一個高生產力的地方就隨之引出了兩個問題: 一是關於各個公司企業實際資產如何處理的問題, 特別是關於如何處理原料和制成品存貨的問題; 另一個是有關農產品收入, 特別是稻米收入的問題。毫無疑問, 稻米是台灣外在收入的一個很好來源。因為我們都知道台灣稻米一年兩熟, 而其中的一次收穫就足供全島所需, 另外一次收穫當然就可以用來出口了。

然而, 對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 所有能換取的每一塊錢都被投進中國大陸經濟的無底洞里。舉例來說, 台灣所有砂糖存貨的八分之七都必須繳交給 [行政院], 私人公司只可以保留八分之一。

一九四六年四月一號, 台灣省政府發布一道命令, 表示沒有任何資金可提供給工廠重建, 這就意味著任何進一步修復工作將必須在沒有利潤的情況下完成。也就是說, 利潤可能在修理完成以前無法獲得, 而這就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貸款無門 ***

有些工廠發現他們甚至沒有足夠的資金來為他們貴重的機器修建擋風避雨的廠房。但是當業者向銀行申請貸款時, 發現銀行根本沒有資金。有時候情況倒沒有這麼極端, 一家公司開始修復工程, 而且也得到分配給他們的資金的一部分。但

是當工程繼續進行時，進一步申請貸款就揭露了再沒有更多資金可供借貸的事實。接下來當然也就是停工以及那些已完工部分的惡化。

台灣收入的一個來源是來自巨大的鹽床。這些鹽床分布於全島幾個地方，特別是台南安平。一船接一船的鹽被運往日本，但這卻只是單向貿易。由於總體的貿易政策，台灣並無法直接從日本得到出售這些鹽的款項。

類似情況也發生在稻米和煤炭交易上。但是在稻米和煤炭方面，進口者則是中國大陸，因此台灣人諷刺地形容他們出售這些財富之后所唯一得到的，是那些已經在台灣當權的大陸人接來一批無用的親戚和朋友。這些人大部分不適任他們已經占據的職位，因此自然成為他們所處有關企業里一股開倒車扯后腿的力量。

[迅速發財致富] ***

他們脫延工作進程，根本不該賺取這分薪水。但如果企業賺得利潤，卻一定也包括他們一份。他們通常對紅包非常注意，而且把台灣視為一「迅速發財致富」的地方。他們通常和台灣人一起占據一個職位，但這個台灣人僅管得到一樣的薪水，卻無法像大陸人一樣得到同樣的補助和津貼。

舉例來說，大陸人經常得到免費住房和額外的海外津貼，以及比市價低的米糧配給。之后這種購買比市價便宜的米糧的特權更擴大到所有政府僱員身上。

國民黨當局把台幣和中國國幣掛鉤，由於中國大陸劇烈通貨膨脹，台幣自然也只有跟進。反過來說，台幣如果不和中國國幣掛鉤，如果台灣能夠從其出口貨得到信用，毫無疑問的，台灣就不會有通貨膨脹問題。

台灣擁有煤炭，稻米和鹽的大量出口以及相對來說沒有特別需要進口的東西，因此台灣擁有巨大的外在信用以及在一般情況下可以自給自足的現實條件。那些教育程度比較好的台灣人認識到這點，因此對大陸人加諸在他們身上的負擔格外感到強烈不滿。

當然了，還有從大陸來的國民黨官員以優惠匯率直接把錢從台灣匯到大陸。像澎湖縣長的主任秘書在上任兩個星期后，就把「積蓄」十五萬台幣送回中國老家。由於通貨膨脹的結果，積蓄越來越不值錢，許多台灣人發現他們自己正在破產的路上。與此同時，對貿易的層層障礙和限制也限制了許多人生計，使得他們無法克服物價的上漲。

又上了一次當 ***

這種對許多小企業家來說還是新鮮事的通貨膨脹現象，使得他們認為唯有增加

利潤才能繼續生意。有一次在我演說后，一名企業家對我說，他從來不知道衡量企業狀況的安全標準是是否能維持生產能力。這也就是，企業家為制成品收取的價格不但必須包括足夠的利潤，而且還得包括任何用在生產該制成品有關的費用。

由於通貨膨脹，連稻米也出現短缺。一般相信這是由於稻米被官員大量收買然后秘密出口到中國大陸，因為稻米在那里可以賣得高價。這是一項非常有利可圖的商品。官員們曾經表示，米價的高漲是因為米商囤積。他們表示，如果米商肯把他們的囤米在市場出售，米價就會降下來。

台灣人也同意這點，於是紛紛把庫存的許多米涌進市場出售，但結果米價並沒有因此有所下跌。台灣人於是相信國民黨政府官員又再度耍弄了他們，他們這樣做的結果只不過提供更多可供出口到上海的稻米罷了。

更有甚者，負責官員卻繼續批評所謂的「邪惡米商」，並且企圖把他們當做人民日益不滿的替罪羔羊。下面這段話是從一九四六年二月三號台北出版的「大民報」上摘錄下來的：

「台灣的國民黨陸軍參謀長在一次台灣省商人會議上發表演說時討論到糧食問題，他表示 "如果發生任何農民攻擊囤積稻米商人的暴亂，政府將不會保護商人"。」

然而，這種對無法無天的煽動在這個月底就發生了影響。但是，被暴亂攻擊的卻不是米糧商人，而是國民黨政府自己本身。

在一九四六年十月金圓券發行的頭一天，一名來自大陸的中國人試圖在「台灣銀行」開設一個新帳戶。他提出了千百萬這種新發行的鈔票要來存款，事實上其數量比已經發行的金圓券數量還多。

對於這種奇怪的行徑他解釋說，他看到報上宣布這種鈔票將在這天發行，而他希望把過去在上海的一位朋友給他的這些鈔票來開設一個帳戶。進一步詢問的結果發現，他的這位朋友也是前國民黨中國行政院長(譯注：即宋子文)的朋友。

這只是我聽到的一個例子，但是卻很可以由此推測當時發行了多少這樣的鈔票，由于沒有相應的收回原來的鈔票，這種新鈔在市場上泛濫也就可想而知了。

黑市美金 ***

這種胡搞瞎搞不只是某些政府官員的個別行為，而是各個政府機構一起這麼做的。其中最大的監守自盜之一就是利用進出口支的支付來大撈特撈。貨幣的兌換率

有兩套，一套是官方的兌換率，一套是黑市的兌換率。

如果一名出口商從美國獲得了美金的信用狀，他必須立刻把它交給 [中央銀行]，而 [中央銀行] 就把它以官方匯率兌換成中國國幣或台幣。照理，當這名出口商想在美國購買東西時他可以從 [中央銀行] 得到這些美金，但是當申請人向 [中央銀行] 提出兌換美金的申請時，答案全都是沒有美金。于是只好求助於黑市，然而黑市美金的價格卻是官方匯率的三倍。

這就變成為了在美國購買一塊錢美金的貨物，卻必須得到三塊錢美金的信用。至於那些繳交給 [中央銀行] 的美金下落，一般看法是立刻被政府官員自己買下，然后在黑市出售。這使得銀行里的美金總是短缺，但黑市的美金供應卻總是足夠充分。

我前面已提到的一個現象是，私人企業不可能從政府來源獲得貸款，由于通貨膨脹日益高漲，私人企業獲得貸款也就更加困難了。一名(契)需資金的企業家每天必須為一百元台幣的貸款付出六分錢，這實際上也就是每年的利息高達百分之二十二。

很有趣的一個現象是，台灣私人企業家擁有的財富數量驚人，他們當中有些人也認識到通貨膨脹的危險，于是非常渴望把他們的錢投資在看得到的產業上，特別是購買更多他們認為具有工業潛力的工廠。

殺雞取卵 ***

舉個例子來說，在嘉義，有些日本人的工廠已經停滯在那兒快兩年了。有些台灣人想要購買。這對減輕嘉義地區嚴重的失業現象可以說是好主意，但他們卻無法做到這點。一間紡紗廠被國民黨台灣省政府賣給大陸的一家公司，整廠的機器也因此搬遷。工會工人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對這項搬遷提出抗議，但沒有得到下文。據估計，這家工廠至少可以創造一百五十到兩百個就業機會。

同樣在嘉義鎮，國民黨政府的衛生局接管了一家原來是日本私人擁有生產醫療注射器的工廠。由於工廠已經停產，工人們也失去了工作。半數的機器已經在市場上出售，衛生局也沒有表示這家工廠是否將再度恢復生產。這家工廠曾經僱用了一百到兩百名員工，由於這家工廠的所在地是以農民為主的地區，因此估計直接間接受這家工廠停工影響的人，包括農民在內大約有九百人。

比大陸人工作勤奮認真的台灣人始終不解，為什麼國民黨政府官員對恢復台灣回到正常狀態做得這麼少，隨著貧困越來越嚴重，這種情緒也就更加困擾他們了。

甚至連最沒有觀察力的人也會承認，國民黨政府從日本人手里得到極端豐厚的戰利品。所以他們打算盡可能把東西運往大陸。但是很顯然的，這些中國人沒有認識到，他們這種做法只會大大減少他們未來從這個島嶼進一步獲取更多財富的機會。事實上，如果他們再繼續用這種辦法干下去，幾年內他們就會把台灣的生活水平降低到和大陸一樣。

第六章 澎湖的故事

澎湖群島為一群終年海風不斷的荒涼小島，距台灣西部大約四十英里，兩旁則是台灣海峽洶湧危險的海流。馬公是澎湖群島里最大的一個村落，農業和捕魚是這裡的主要營生。農業是在十分困難的確情況下進行的，主要作物為花生和蕃薯，所有的耕作都必須防范由強烈海風帶來的鹽分。在許多情況下當地人用石塊建造擋風牆來保護農作物。石塊在澎湖倒是很多的。

在二次大戰前的年代里，這裡的捕魚業非常發達。舉例來說，在一九三〇年這一年，澎湖有六千人以上從事捕魚業，總共捕獲了兩千兩百噸的魚產。這些魚產都被運往本島和日本。為此日本人建立了非常現代化的相關設備，其中包括保存魚獲所需要的大規模制冰廠。

但是戰爭期間日本人征用了許多漁船，剩下的魚船后來也被盟軍炸毀。這對澎湖居民造成了兩方面影響。一方面使得澎湖人賴以為生的魚獲減少到幾乎飢荒的邊緣，另方面也造成澎湖人失業。

另一個引起澎湖人失業的原因是日本人在馬公附近興建的大型海軍基地被關閉。這個基地曾經被用來支持日本的南向政策。但可能由於日本航運的短缺加上戰爭期中維持補給困難，馬公軍港被棄置不用而由新建成的高雄左營軍港取代。但這樣一來就使得澎湖又有三千人失業，使戰后的困難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自大戰結束後除了美國軍事人員外，據知只有一名西方人訪問過澎湖。他是一名來自美國的「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檢查員，他在返航時差點因船難喪生。「中華全國救災及重建署」已經在澎湖開始了一些土木工程，而且正進一步派遣人員和物資到那里。因此這被認為是「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派遣官員訪問澎湖的一個好機會，於是我接到指示和我的翻譯從基隆搭乘上面載滿補給物資的船出發前往。

第一次嘗試 ***

由於糧食短缺，我們也帶了自己的口糧。當我們在一個清晨按照指定時間抵達這艘船的時候，這艘船的半柴油引擎剛剛開始發動。經過四個小時試車后，建造這艘船的廠家肯定無法在今天內讓這艘船達到適合航行的狀況，於是我們只好返回台北的辦公室，並且按照指示準備第二天早上再來。但是到第二天，雖然引擎狀況有所改善，仍然還不適合航行。

不過由於天氣晴朗穩定而且可能繼續這樣好天氣一陣子，航行的危險似乎並不太大。所以到中午時分，在大量的餅乾裝上船后，我們開始出港了。在船走了四百碼之後，我們被拖進船塢邊，船長上岸去領取通行証件。但是不久后他回來說，那名通常應該簽發文件的官員不知何去而且也沒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船長懷著希望這名官員已經返回的心情幾度造訪仍然無功而返后，我對這種明顯的官僚作風開始感到不耐了。由於我當時身穿軍服，因此船長希望我能陪他一起去也許會有好的結果。我照做了。事實上我們並沒有見到任何一名海關官員返回。但二十分鐘后，我們還是拿到了所有必要文件，承辦官員還再三向我們道歉。

無論如何，我們的麻煩還沒有度過。由於那位柴油引擎專家決定這艘船還不適合海上航行，我們於是又返回原來停泊的地點。當時決定這艘船的引擎必須徹底檢查，要到下星期一才能出海。

到了下星期一，又看到我們這群人再度上船，然而這艘船還是沒有準備好，仍然還得等到 [明天]。星期二我有很重要的工作所以無法前往，但是到星期三時，我們赫然發現船真的已經開走了，而我們卻不在上面。后來我們才得知，這艘船在沿著海岸航行不到幾英里時，引擎再度故障，船被浪沖到淡水河口一處沙洲上。之后有一次我到淡水河口的海灘去曬太陽時，赫然看到這艘船被拖上岸而且正進行修理。

第二次嘗試 ***

自從知道我們原本要搭的船已經離開后，我的翻譯和我轉向台南和高雄尋求其他合適的船去澎湖，但是找來找去，最適合我們的大概就是搭星期五下午四點離開的船(支)了。雖然這艘船號稱有一百二十噸，不但超載了乘客和貨物，而且還骯臟無比。在甲板底下我們預訂了一個房間，但是當我們才把頭伸進船艙樓梯通道時，就有一股惡臭迎面撲來，於是我們決定還是待在甲板上比較好。

這艘船最乾淨的地方是它的船尾部分，於是我們帶著自己的行李坐在船尾，同時觀察我們同船的乘客和他們的情況。船的兩邊堆放了成捆甘蔗，目的是為了不讓

乘客靠在船邊，通常來說這是中國航海人員經常而且必須採用的一個作法，由於乘客擠得水泄不通，所以在甲板上行走必須非常緩慢小心，但值得安慰的是，這艘船的引擎已經運轉，而且運轉得很順暢，到了預訂時候我們就經過港口出航了。

在那點綴著沉船桅杆的高雄港外，我們注意到有一股強大海流預示著我們這次航行會很困難，事實上在洶涌的海浪下，很多旅客不久就受到它的影響，幸運也好或者不幸運也好，那時天色已黑，經過幾個小時當暈船現象越來越普遍后，突然間這艘船被巨浪打得一個急劇顛簸，接著又一個劇烈的顛簸使我的臉貼進水面不到六英寸，不久之後海面又好象在我腳下三四十英尺，我當時只記得，如果我還想待在船上，就必須緊緊握住可以握住的任何東西。

之后我只依稀記得來了好幾個劇烈嘔吐，直到連移動身體的力氣都沒有，最后天亮了，我看到前面出現一個港口，而且立刻想像日本人似乎有一個標準的港口設計，但我那已經頭暈眼花的腦子花了幾分鐘時間才發現，我們的船其實正返回高雄。

我們的狼狽情況只能用想象才能理解，我們都已經累得癱軟無力，但由於我們身上是如此骯髒惡臭，人力車夫又不願意把我們背下船。

最后，我們總算到達一家旅館，好心的旅館老板準許我們住進后面一個房間，讓我們洗澡，把我們的衣服送進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洗衣店，我們則在床上足足躺了二十四小時才恢復體力。

終於去成了***

事后我們得知，我前面提到過的強大海流強烈到不得不使船長掉頭返回高雄，但是在進入高雄港之前，海面忽然非常平靜，於是船長又再度掉頭打算橫越危險的海流，但是這次船開始漏水，必須用幫浦不斷抽水以維持船內的進水量在控制之下，同時以全速飛奔返回高雄，但如此一來，我們已經在船上折騰了二十個小時。

澎湖仍然像過去一樣的遙遠，澎湖縣政府在高雄的一些代表官員前來拜訪我們，可不是說笑話，我們告訴這些官員，在我們再度試圖橫越海峽前，應該給我們提供一艘配備良好引擎而且不會漏水的海軍船支，與此同時，我收到來自台北的電報，在我動身返回台北前，我決定去看看這些官員，看看是否我們拋棄了苦難中的澎湖群島。

就在第二天星期四，澎湖縣政府撥電話給我：「海軍船支在星期六上午開航，你能上船嗎？」所以我們再度出發前往澎湖，這一次我們的隊伍因為加入了兩名

[中華全國救災及重建署] 的工程師而擴大。這兩名工程師曾經搭過後來在淡水河口擱淺的那艘船。他們後來是被一艘海關巡邏艇救起的。

我們到達位于高雄的海軍基地入口，但是在通過檢查哨時遇到了一些問題。其中一名 [中華全國救災及重建署] 的工程師會說中國普通話和兩種方言，所以我們通過兩個哨所，但是當我們到達第三個把守碼頭邊的哨所時，我們的工程師兼翻譯人員卻遇到了很大困難。在這裡已經可以看得到在等候我們的船支了。

最后，這個哨所的看守把另一個哨所的看守找來，加上我們的翻譯，三個人一起密商，試圖交換各自的看法。我們的人則一直在手掌上劃些中國字。但不幸的是這名哨所看守是文盲。最后直到一名國民黨軍官騎腳踏車從船上過來，再三向我們道歉耽誤了我們時間，讓我們感到丟臉等等，這幕戲才算結束。

救人其次，面子優先 ***

這是一艘排水量四百五十噸的軍艦，艦長和軍官列隊出來歡迎我們。在儀式結束後不久我們發現，為了讓我們有一個愉快旅程，他們對我們的安排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當時甚至連海面也像玻璃般平靜，頭頂上湛藍的天空似乎也預示者這是一趟美好旅程。當我們在馬公下船時，上自縣長，下至警察局長，馬公鎮長，以及一大批政府官員已經等在那兒歡迎我們。在和艦長道別后我們被帶進下榻的旅館，並且立刻開始討論當地情勢。很顯然，那里的一般情況可是非常糟糕，所以我立刻打電報到台北要求提供救濟物資。

對於我們要求給澎湖運來救濟糧食的故事也許也值得記載下來。當時已經在基隆準備了五百噸稻米，而一艘英國船正準備從基隆空船開往廈門，因此可以順便把這批糧食中途運往澎湖。因此和代理商達成協議，把這些極需的食物運送到澎湖。但國民黨中國的行政院卻下令禁止這項運送，因為中國的海事法禁止在中國港口之間使用外國船(支)運送貨物。

最后花了幾個月時間，才總算把足夠的糧食運到澎湖，但毫無疑問的，一定有許多人已經在這段期間餓死，然而這就是國民黨中國堅持主權的作法。

在我們到達澎湖的那天晚上，澎湖縣長請我們吃飯，之后招待我們觀賞一些愛國主義的宣傳影片。然而當影片放映時觀眾的交談仍不停止，影片里的對話根本無法遮蓋觀眾的喧嘩，使得我也無心觀賞。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的時，我們全都去教堂參加一個半正式的集會，我的翻譯在那里發表演說。同樣地，我則在下午的集會上發表演說。這間教堂是由 [英國長老教會] 所興建，他們的活動和 [基督教青年會] 關係密切。由於這座教堂的一

些房間被盟軍炸毀，因此只有情況還相當好的正堂本身就成為了主日學和社會活動使用地點。到了晚上，馬公鎮長正式宴請我們。

飢荒邊緣 ***

星期一，我們訪問了漁村，雖然他們沒有把最糟的情況給我們看，但是我們仍然注意到人們的健康狀況很差。在返回馬公的路上，我發現鎮上許多地方張貼了用中國字書寫的海報，而我認識其中我的名字。

在和我們磋商后，當局在電影院舉行了一場青年會議。主持人宣布：「紐西蘭的謝克頓先生，上海的吳先生，以及美國的易先生將聯合公開講述各自國家的青年組織狀況。」我們和「基督教青年會」主任共進晚餐，在我們進入電影院開始演講前，電影院里已經擠滿了觀眾。我們受到熱烈歡迎，我們每一個人的演講觀眾也仔細聆聽。從各方面來說，顯然這都是一次很成功的集會。

第二天早上我們檢查了一處海堤，這個海堤是為了救災而興建的，目的是把過去本來是海底淤泥的海床變成農田。這個海堤大約有半英里長，在海堤的盡頭是一個村莊，這個村莊對我來說似乎比海堤本身更有意思。所以在我們檢查海堤之后我們要求進入這個村子參觀，雖然此舉顯然違反了陪同我們參觀海堤的國民黨官員的意願。

在那里我們發現了飢荒確實存在。我察看了一個四合院，那里到處飛舞著蒼蠅，到處散放著破爛。一些衣不蔽體骨瘦如柴的孩童站在進口處附近，房子里則有一對中年夫婦在準備食物，時間大約早上十點半左右。詢問之下我們才發現，由於糧食短缺他們只得把早餐和午飯合起來當做一頓。他們認為這還是幸運的，因為他們還有足夠供他們再吃一星期每天兩頓的糧食。但這些食物吃完了該怎麼辦呢？

他們希望在這些食物吃完前能捕到一些魚。這些只有馬鈴薯配上一些小魚的食物使他們越來越衰弱，弄得日常活動對他們來說都很吃力了。當小孩子因飢餓而啼哭不止的時候，他們就再給小孩吃一頓，而自己不吃。孩子們也因為太衰弱和飢餓而無法上學，而且也沒有衣服穿。所有的衣服都已經一補再補，破爛不堪。大部分時間都是女的在回答問題，男的似乎沒有力氣說話。女的嘴唇蒼白無比，而且每個字都似乎費盡力氣才吐出。這家人的情況在這個村子里是很典型的。

可憐的婦人 ***

在我們回到住處時，我們又受到了一次設想周到的晚宴。晚宴后我們參觀了發電廠和制冰工廠，那里主要令人感興趣的是技術方面問題。這間制冰工廠每天生產冰塊的能力是十五噸，但由於捕魚業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因此一天只制冰一噸。

半。

接下來我們參觀另一座窮困的村子，那里的情況和我們已經參觀過的那個村子差不多。其中有些人已經減少到一天只吃得上一餐花生和蕃薯。在這個人口超過一千七百人的村子里，跟在我們后面的人群越來越多，突然間從人群中竄出了一名男子，他把他那被截（支）后形狀可怕的右手露給我們看。雖然傷口已經（育）合，但是仍可怕的變形。這個村子曾經遭到盟軍轟炸，很顯然，他的手臂就是那時被炸斷的，同時又沒有得到好好的醫治。

我們走到村子盡頭然后循原路回返，這一次我們碰上了一大群看起來不太友善的群眾。為首向我們走來的是一名中年女子，她看起來焦慮，纖瘦而且脆弱，但是從她的步伐和臉上表情可以看出她的決心。她向我的翻譯說了一大堆，當我問我的翻譯究竟是怎麼回事時，我的翻譯仍然無法打斷她連關炮式的說話來回答我。我看得出這名女子幾乎要掉下眼淚，聲音也開始沙啞。最后由於抽泣的關係她不得不停止說話了。

我的翻譯這才告訴我，這個村子遭到美國飛機轟炸而她那不是軍人的丈夫被炸死，留下她一個人要撫養七個孩子。她說：「這在平時就很困難了，現在就算是有丈夫的女人要撫養家庭也非常困難。我已經為了張羅食物養孩子經筋疲力竭，而孩子還是挨餓，我真希望我的丈夫能幫助我。」

該婦人所遭到的困苦只不過戰爭蹂躪的其中一個例子。不過這倒使我突發奇想，究竟有沒有必要轟炸這個顯然無害又平靜的村子？也許當時確有這個必要，但令人難過的是這名婦女和她的家庭卻因此付出慘痛代價。

所有洋人都是 [美國人] ***

當這名婦女結束抱怨的時候，整個抱怨的情緒開始擴散開來。我的翻譯告訴我，另外還有幾名婦女也準備向我訴說同樣的故事，他認為我們最好盡快離開這個地方。所以我們在表達了我們的同情而且保證盡力幫助后，趕快離開了。

這天晚上我在旅館里體會到一件事。我問我的翻譯：「村子里那個丈夫被飛機炸死的婦女以為我是美國人嗎？」

他回答說：「是的。」

「這樣，我就對她的困難和苦楚負有某種責任了？」

「是的。」他回答。

于是我決定將我的配給口糧交給這名婦女以示我的同情。幾個月后我收到她寄來的一封信外加一份收據。我引述這件事只是希望作為一個例子，說明我在台灣許多地方都發現人們具有誠實的品德。

這天晚上我們在被用作為交宜廳的教堂里晚宴。晚宴是由基督教女青年會和這間教堂以及我翻譯的學校朋友聯合宴請的。他們全都希望請我們吃飯，但由於這是我們在這里的最后一晚，於是他們聯合做東。這次晚宴里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是馬公鎮長夫人特別烹煮了一餐西式菜[遙]。包括了煎蛋，煎豬排，蕃薯，白蘿卜和奶油調味汁。

這種變化我非常欣賞。我們努力吃飯，很少說話。席間沒有女客--- 順帶提一句，在中國傳統正式晚宴里，女主人只是出來協助上菜下菜這一類事。所以在晚宴過後，我們前往牧師家去拜訪牧師娘。

在那里，牧師講述了基督教在日本統治時期的艱難局面，甚至在目前，由于不同的理由，他們的生活也非常艱苦，這使得他們非常氣餒。但我們以及我們的談話給了他們新的展望和鼓勵。

幾時再相會？***

我們在依依不 中道別，因為明天一早就要啟程去高雄了，而我懷疑以后是否還會再來澎湖。在我停留澎湖的短短幾天里，我非常喜歡那里的人，我相信他們也同樣喜歡我們。

第二天早上澎湖縣長親自送我們上船，這艘船正是我們來澎湖時所搭乘的同一艘運輸艦。當我們到達碼頭邊時，已經有幾百人等在那里歡送我們，我們足足花了五分鐘時間和他們一一握手道別。回想起昨晚向他們道別的情景，我忽然發現我已經被這裡的友情和友好深深感動了。

現在，[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 已經關閉了，加上了解到澎湖人從國民黨政府得到救濟的機會是如此渺茫，我真不知他們怎麼熬得下去？

第七章 導致抗暴的事件

所有大陸人的不當管理，惡劣行為，鐵石心腸，冷漠自大等種種因素，事實上都

是導致暴亂發生的一個原因。當然了，前述各章節里的有關現象，在這一章里還會有更詳盡的描述。就是這許多原因綜合起來達到了高潮才促使台灣人走向抗暴。

台灣人眼見他們的島嶼被搶劫，富人變成窮人，窮人則受到飢餓的煎熬，有些地方更落到餓死人的邊緣。與此同時，他們卻眼見新來的大陸人開著豪華新車四處兜風一概不缺。

這本來就已經夠叫人無法忍受了，偏偏所有大陸人還個個趾高氣昂態度傲慢，台灣人認為這根本一點也沒有道理。他們眼見大陸人攫取了完全不了解內容的主管職位，去和已經與中國大陸分離五十年，在心理上，社會上，經濟上和精神狀態上都比中國遠為進步的人民打交道。

古代人管理現代人 ***

大陸人的錯誤是企圖把古老文明的習俗強加到一個現代工業化的島嶼上。這就好像要把油跟水融合起來一樣。台灣人因此嘲笑中國人這種荒謬的希望。然而台灣人越是嘲笑，越激起中國人採取更傲慢的態度來保護自己。于是乎，就這麼惡性循環下去。

台灣人認為中國人基本上只關心如何掠奪財富，毫無公共服務的概念。舉例來說，當霍亂爆發時國民黨衛生當局顯然無動于衷，隔離檢(易)的馬虎隨便和毫無效率甚至連台灣人都感到震驚。順帶一提的是，[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 官員當時要台灣實行隔離檢 (易)的國際規則也遇到很大困難，至於徹底實行那就更不用說了。

除此之外，台灣人還發現中國人實際上並沒有打算為台灣進行戰后重建，甚至沒有計劃重建被空襲損毀的民房。這些人家現在居住在簡陋的茅舍里。但是對於日本政府在戰時為了限制進一步建築而征收的稅，國民黨當局倒是很認真的繼續執行。

舉例來說，台灣人在戰后頭兩年裡為了重建房舍而千辛萬苦最后在黑市才買到水泥和其他建材，等到房子重建完成以為這下子苦難終於度過的時候才發現，因為他們建了新房子而需要繳交四百元台幣。

當你在許多城鎮里的街道上行走時，所到之處都是一片困苦景象。瓦(麗)當中長出了高高的野草，鋼骨水泥的房子骨架旁經常是臨時搭建起來四壁透風的茅舍。在有些地區，一些具有公共意識的台灣人自行組成了救濟委員會，致力救濟那些比較不幸的人。事實上他們本身也因國民黨的倒行逆施而財務困難，換句話說他們並沒有能力完全幫助其他周圍人的困難。

社區自救 ***

在一處救濟中心里我看到十四家人家（每家大約十人）居住在簡陋的茅舍里，每一茅舍的面積大約十二英尺見方。其中一半人家有日本式地板，其余人家則只有泥土地了。這些人家的內部真是又臟又亂又悲慘。孩子們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全身還有許多爛瘡。像一名男孩的雙手，爛瘡的面積比正常皮膚還來得多，使得蒼蠅老叮在他的瘡口上。這種可憐景象大概只有乞丐可以形容。

對於為什麼他們沒有從「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得到救濟這件事我們進行了調查，得到的答案是，所有申請都必須透過由國民黨中國人擔任的市長，而這位中國人市長不知是不是出於「面子」問題，始終沒有轉交這些申請，於是這些台灣老百姓也就只好繼續忍受悲苦生活了。

失業狀況也繼續惡化，失業者期望他們曾經工作過的工廠 --- 特別是私人工廠 --- 再度復工的願望也完全落空。而失業的最終含義就是挨餓，但這些台灣人也為此做了努力反擊。很常見的一個景象是，比鄰的幾家人合力把瓦(麗)清掃出來，然后在空地上種植蔬菜。有時甚至連柏油馬路邊的狹長綠地都被用來耕種蔬菜。我總是在想，這又得歸功於台灣人的誠實風氣，因為在飢餓如此普遍的情況下，一個人在這麼公開的情況下耕作而不用擔心果實會遭人偷竊，這不是得歸功於社會風氣的誠實是什麼？

隨時 備撈一票 ***

失業情況因為國民黨「用人唯親」的裙帶關係而更加嚴重，許多職位不管合不合適，國民黨都照樣據為己有。這種現象發生在所有政府官員或職員上。特別在教育界更是明目張膽。有時候報紙上刊登了台灣人校長被革職然后任命新校長的消息，但是卻不解釋原因。

一九四七年二月初在高雄女中，新來的中國人校長一口氣開除了四名台灣人助理，然后由他自己的人馬接替這些職位，這件事激起了學生家長會出面要求這位校長停止這種做法。其實這在中國是很司空見慣的，當統治者或領導人有所改變時，其下的人事也就跟著改變，因為他們只在乎自己的安全才不在乎誰適不適任，因此其屬下很自然的會企圖見機行事，隨時「撈上一票」。

台灣人非常了解良好教育的優點，在日本教育體制下，教育的成本包括學費和書籍費都非常便宜，因此幾乎每個學童都負擔得起。中國人來到后立刻堅持必須在所有學校和所有政府機構說北京話。於是就發生了一些有趣現象。有一次我在前往火車站的路上，我以為我聽到了一場什麼討論會，走近一看，才發現所有火車站的台灣人員工正聚在一個小房間里學北京話。我後來發現，這種現象在台灣人

被僱用的地方非常普遍。

為了努力排除日本話，學校里的日語科目完全停止，中文(國文)變成最重要科目。當然了，所有日文教科書也都被銷毀，由中文教科書取代。但是無論如何，中文並沒有代數，幾何或貿易方面的書籍。一名從中國大陸到台灣一所中學教數學的中國「教授」，開始時竟然問學生「幾張椅子加起來共有幾(支)腳」這類的小學生問題。

不懂代數的「教授」***

由於實在忍無可忍，班上一名聰慧的男孩表示，他們的上一堂課已經教到二次方程式了。這位「教授」發現這已經是代數了，最后只好承認他不懂代數退休了事。在我的台灣友人告訴我這件事時，台灣的中學還沒有開始教數學。同樣地，有一位英文老師的唯一資格，就是他曾經在香港住過六個月，而我和他之間根本無法用英語交談。

所有這些都顯示台灣的教育水平已大幅下跌，台灣人也越來越懷疑這是國民黨當局企圖把他們變成文盲種族的做法。他們認為中國人在來到台灣后發現這裡的知識水平和識字率都遠遠高出中國大陸時，深感丟臉難堪。

究竟台灣人在這方面的懷疑有沒有根據我不得而知，但是有一次一名國民黨官員倒的確曾經對我表示：「為什麼要準許台北和高雄之間每天開四列特快車？上海和南京之間每天只開一趟快車呢。」

當我在全島旅行候，我察覺到緊張情勢正在升高，而且有報導說由於台灣人的職位被中國大陸人替換的情形越來越普遍，已經發生多起罷工事件。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位於高雄的「台灣鋼鐵公司」的所有工人 --- 大約九百六十名男子因為和警察發生糾紛而進行罷工。這些工人反對把中國人安插在他們頭上，同時又把能干的台灣人撤換下來。

當警察被召來時都配備了左輪槍，但是才一進入廠區就被繳械。這些台灣人表示希望這件事能夠得到和平而且公正的解決。但結果卻有更多警察被召來，工人們於是開始更大規模的罷工。直到兩三個星期后雙方才達成協議。

一連串罷工 ***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台灣城業公司」高雄廠為了和上述「台灣鋼鐵公司」同樣的理由有兩千人進行罷工，他們要求得到和中國人一樣的平等對待。最后當管理階層向他們的要求讓步后，他們返回工作崗位。位於高雄的水泥工廠也採取了類似行動。

在[台灣開發公司]里，許多國民黨高階層官員也公開參與。這個公司當初是由日本人組織起來的，目的是為了發展台灣農業，商業和工程技術。一九四六年九月，[台灣開發公司]有一千名員工罷工反對以中國人出任負責人和高級主管的方式來重組這家公司。最后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不得不下令這家公司不必改組，台灣人主管可以繼續留任。

其實台灣人也理解戰爭結束後必然帶給他們生活許多困難。但是使台灣人憤怒的不只是國民黨政府漠視他們的困難，更因為國民黨政府貪婪又暴虐，正是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貪婪和暴虐使得他們的困難才無可估量地增加。

我已經指出，國民黨政府的規章經常瑣碎細密，然而所有這些規章的目的都是為了增加攫取金錢的可能性，不管是為了國民黨政府或官員自己，或兩者都是。對貿易不斷增加的限制導致破產和崩潰，特別是對資金本來就薄弱的小貿易商而言。若就米價的高昂和米糧的缺乏來說，破產顯然就意味著挨餓的第一步。因為小商店主和貿易商通常連小塊的空地都沒有，所以無法靠種植蔬菜來增加食物。

局勢惡化 ***

總之，隨著越來越多的失業和游民們益發飢餓，甚至連感覺最遲鈍的人也會感覺到這個島嶼正在走向麻煩。如果說國民黨政府知道這點，但是卻一點也沒有改變他們的政策。問題的最后高潮終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來。國民黨警察試圖在街頭小販身上執行一項禁止販賣外國香煙的新規定。

由於生活艱困，小販和路邊攤已成為台灣城市的街頭一景。參與這些活動的人包括所有年齡層，從男童，女童，到老先生，老太太都有。其中有的有張桌子擺在路邊，攤販則坐在桌邊小凳子上。有些攤販特別是小孩子，則用繩索套在脖子上，在胸前托著一個小托盤，上面可以裝著大約五十包香煙。他們在餐館，辦公室，或任何他們認為有可能買香煙的地方鑽進鑽出。他們的模樣可憐，因此雖然很煩人，但似乎並沒有人硬的起心腸來把他們攆開。

一個在辦公室門外擺香煙攤的人，要等到有人從辦公室里出來買上一包煙的機會其實是很微小的。他們的收入顯然不可能有多少，因此若非極端窮困不可能做此買賣。只有在極端窮困的情況下，這種微薄的收入才可能有所幫助。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

外國廠牌的香煙當時是最受歡迎的，因此小販往往在眾多的中國廠牌香煙中，夾帶很少幾包外國香煙兜售。換句話說，禁止銷售外國煙的命令意味著對街頭小販一個嚴厲打擊，而且就像其他這類所有規定一樣，沒有人會去注意它。不過無論

怎麼說，如果這名警察不那麼愛管閑事不拿著雞毛當令箭的話，[二二八] 這個反抗的不幸日子也只是延后發生罷了。

事情的經過似乎是這樣的：公賣局的一名警察禁止一名婦女販賣外國香煙，這名婦女回答說，這是她維持家人生計的唯一辦法，如果他要阻止她，為什麼不去阻止那些 [上層人]。這名警察於是把她打倒在地，旁邊圍觀的忿怒人群立刻過來攻打這名警察，但這名警察隨後乘隙溜掉了。

此時旁邊的其他警察不但不過來援助同僚，反而也紛紛開溜，其中一名警察則可能因為驚慌過度，轉身向追打他的群眾開槍，打死一人。

群眾於是更加怒氣沖沖的前往公賣局，且放火焚燒，公賣局里的中國人職員此時都全數逃跑 --- 暴亂於焉開始!

第八章 陷入暴亂

三月一日星期六的時候我在高雄有事要返台北，但當我到高雄火車站要買票時，得知台北的鐵路正進行罷工，所以沒有直達台北的班車。同時也有謠言說，台北發生街頭巷戰，有些學生被打死。這些謠傳後來被證明有些是事實。

基於此，我的翻譯和我認為此刻留在高雄應該比較正確。第二天，車站官員通知我們，暴亂已擴散到新竹，因此還是沒有班車。而就在這一天，曾經和我一起工作的 [中華全國救災及重建署] 的一位中國朋友警告我說現在開始會有大麻煩，因此我應趕快 [走開]。當我問他我該走去哪里的時候，他卻也說不出來，只是一再堅持說我待在高雄非常不安全，因此我應該躲到別處去。

他的理由顯然沒有說服我，因為我已來過高雄好幾次，總共加起來可能有一個月時間，當地人對我都相當面熟，我在高雄努力協助恢復那里工業的工作，也廣為人知。因此我認為，我留在這裡應該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樣安全。當然了，我在台北的名氣可能更大，但台北此時已完全 [沸騰]。

另外，當我告訴我的中國朋友他去哪里我就跟他去哪里時，他表示，他要去的地方是我不能去的，並且因為不能帶我同行而再三向我道歉，同時表示這是他接到的命令。我和我的翻譯於是只好留在下榻的 [東元旅舍]。這是一棟三層樓的鋼骨水泥建築，內部裝 [磺] 大體上是中國式格局。

氣氛緊張 ***

星期一早上我們被一列三十名的國民黨軍隊通過聲吵醒，這些國民黨士兵手上拿著帶軍刀的步槍和一挺維克爾式機關槍。整個上午街道上的氣氛都很緊張，人們則一群群地站在四周觀望。

實際上我們可能是唯一在餐館吃飯的人。由於「東元旅舍」的大部分顧客都是中國人，因此被認為可能遭到台灣人的攻擊而成為一個麻煩中心。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決定至少此刻還可以暫時留在這裡。

我們在一家大餐館吃晚飯，餐館人員告訴我們說，這一天他們只有另外兩名客人光顧。天黑後我們聽到人群在街上行進。我聽到有擴音器播放被禁止的日本歌曲，此舉顯然是為了吸引國民黨警察出來。我的翻譯因此變得焦慮起來，他想逃出去，但是繼而一想我們並沒有立即危險，待在這裡其實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樣安全，於是我們又留下來。

我們當時並不知道這個決定還救了一名國民黨警官的命。事情是這樣子的：這名警官因為遭到群眾追趕躲進這家餐館，但是由於我這位西方人還在裡面，所以群眾決定等我離開後再動手。換句話說，我們的延遲給了餐館老板足夠時間讓這位國民黨警官從後門溜走。

返回旅館後不久，我們聽到群眾在街頭聚集，我們從窗口探頭張望，發現位於大約一百碼外街邊的警察局前發生大火。警察已經跑光，警察局里的記錄文件則被群眾拿出來在街道中間放火燒毀。情況看起來是如此嚴重，於是我們決定打包準備應付任何緊急狀況。

不準窩藏中國人 ***

沒有警察或軍隊的跡象，我們看到的唯一中國人則躲在旅館里。我們和旅館客人及工作人員站在入口處。群眾中一名男子從門口跑過同時喊著：「只要你們還留著中國人，你們的旅館明天就會被燒掉。」我的立場最困難了，因為我聽不懂別人說的話，我不知道這些奔跑的群眾是躲避危險還是趕去進攻。

至於我身邊會講英語的人也因為太激動而顧不到我。突然間，有幾顆子彈打到旅館入口處的台階上，我認為還是回到我們那四周牆壁是鋼骨水泥的房間也許比較安全。但盡管如此，我這天晚上情緒仍相當起伏，最後可以說靠了很大努力才似乎入睡。

接著房子里出現越來越多的腳步聲，我對自己說：「就是這了。」於是我由翻譯陪

著走到樓梯盡頭，我們盡可能態度輕鬆地坐在樓梯扶手上。我很高興看到群眾沒有攜帶武器，只有為首的一人帶著一支木棍。

當他見到我時停了下來，向我鞠躬敬禮，其他跟在他后面上樓的群眾也跟著這麼做。他說：「O.K.？」我回答說：「O.K.」他們於是向我的翻譯說了些什麼，在我的翻譯回答后，他們繼續行動。在搜查了幾個房間后返回樓下離去，離去前還再度向我敬禮。

*** [美國領事館] ***

我后來才知道，我之所以受到如此尊敬是因為當時人們謠傳美國領事館就在這棟旅館里，而他們絕不想冒犯美國。他們當時只是要進來抓中國人旅客，而當被告知這裡沒有中國人后，這些群眾就在幾個房間匆匆地粗略看了看，然后滿意地離開。

很顯然，所有中國旅客已經全都去了我在「中華全國救災及重建署」的朋友所去的同樣地方。為了保險起見，我們和衣而臥，但接下來的這晚卻平靜無事。

第二天早上我的翻譯在早飯后外出，打算去看看有什麼事情發生。由於遠處偶爾傳來一些槍聲，他建議我們應該待在旅館里比較好。但我卻有不同的想法。我認為由於當地人們都相當認識我們，因此不至於在緊急時發生誤會。所以我們就沿著馬路走向警察局，果然立刻在那里受到接待，其中包括新的台灣人警察。這些新的台灣人警察現在終於又搶回他們在日本時代就已經擁有的職位了。不過其他所有商店都已關閉，我們連吃午飯都有困難。最后我們努力說服了一家餐廳賣給我們一點雞肉飯，因為我知道這是很容易準備的一道菜。

在返回旅館時，我們成了旅館門口一群人最感興趣的焦點，但我無法確定他們的態度是友好或敵視。經過前一晚的折騰我們實在相當疲倦，所以我決定早早就寢。但是還不等我上床，就有一個消息來問我是否可以協助市長（現在已經是台灣人了）去談判有關停火之事。

我表示願意考慮，但要求市長直接向我提出正式的請求。而就在信使還沒離開前，我收到我的中國朋友捎來的求救信，上面寫著：「謝克頓先生，請立刻協助把我和我的兩個朋友從獄中釋放。我們處境危險。請立刻幫助我們。」

*** 趕到監獄 ***

我於是立刻趕到監獄，透過翻譯告訴這些台灣人說，此人曾經在「中華全國救災

及重建署」工作，我也就是為此前來中國再到台灣來幫助重建工作的。我表示，他們的這名中國人犯曾經在工作上協助我。此外我還敘述了一些我這位中國朋友的工作性質。但這些台灣人說，他們將讓這三人安全地待在監獄並且會好好照顧他們。他們表示，所有中國人都已撤退至海軍基地，而除開海軍基地，這個監獄此時對中國人而言可以說是最安全的。

我的中國朋友表示，他是在離開海軍基地去辦公室處理一些公務時被群眾逮捕的。他想跟我們去我們住宿的旅館，但這顯然會使我們的旅館成為攻擊目標，所以我們拒絕了。

我當初為了保險起見已經把我們的吉普車加滿了油，而且為了做為 "招牌"，我任何外出都使用它，甚至連去距離旅館只有一百碼的警察局也不例外。在我從監獄出來時，我發現我的吉普被一大群群眾圍住，后面則有一些年輕人待在卡車里。我的翻譯對我說："你最好做個演講解釋一下。" 而群眾的態度也讓我毫不懷疑此番演講的內容應該是什麼。

我首先告訴他們我的身分，為什麼會來高雄，在這場混亂中我們嚴守中立的立場，而且為了履行這個立場，我已接受高雄市長的請求，去致力為這個城市促成 [停戰]。群眾對我的演說反應不一，有些人拍了拍巴掌，大部分人則是保持沉默。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隨即坐進了吉普車前往 [人民總部] --- 也就是市政府辦公室。而幾乎就在一條三線馬路的對面，則是國民黨的 [軍事總部]。我們開車經過時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挺機關槍架在 [軍事總部] 的平頂上，士兵們則在房屋的各重要據點守衛。

*** 和國民黨軍方談判 ***

我們是從後門進入 [人民總部] 的。我被帶往委員會，在那里，我的一名台灣人律師朋友似乎是里面的負責人。沒有任何警衛，而且每個人包括我的翻譯似乎都同時在說話，過了大約三分鐘的交談，我的翻譯對我說："好，我們走吧。"

但我回答說："等一下，這究竟怎麼回事？我們要去哪里？去做什麼？誰和我們一起去？"

"噢，" 我的翻譯說："你做為我們代表團的負責人去國民黨的 [軍事總部] 要求停火，他們已同意下這道命令，但是軍方和他們的下屬單位失去了聯繫。"

但我可從來還沒有見過這麼多憂慮的男子，而且似乎連找兩個和我一起去的人也很困難。他們於是告訴我，在過去兩次談判嘗試里，有一名男子受傷，一名被

打死，所以我們這次談判也不必那麼急。但我還是樂觀的想，既然已經做了實際接觸，可以說談判就已經在進行了。

我們從前門走出去同時把手舉起來，我立刻就看到正前方遠處有一挺機關槍和五六支步槍在對著我們。這兩棟樓房之間相距約兩百碼，但感覺起來似乎遠得多。在我們走過一半時，我停下來高喊：[O.K.?]。過了一會兒有人在屋頂上出現向我們招手，機關槍和步槍也從視線里消失。

通過了幾道檢查之后我們見到了負責軍官，他看起來就像對街那棟房子里的群眾一樣憂慮和沮喪。在這裡，翻譯解釋是很困難的。因為我得先向我的翻譯說英語，他再向一名國民黨官員說日語，然後這名官員再向這位國民黨軍官說北京話。

就在我解釋我的看法，其中包括我願意提供我的吉普車讓他們和分遣隊聯繫時，一陣槍聲打斷了我們交談。除我以外在場所有人立刻趴在地上。雖然沒有跡象顯示子彈射向我們這裡，但我決定，如果他們趴在地上不見得是個好主意，我一個人站著也不好，所以我也跟著這麼做了。

*** 事故頻生 ***

我問我的翻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時，他回答說我們遭到攻擊。但無論如何，在趴在地上大約三十秒且一切都似乎平靜后，我獨自一人起身開始偵察。我走進這棟樓的主要部位，那里有些士兵在把守，但他們同樣也躲在掩體下，沒有任何一個人處在警戒狀態。此時突然又爆發一陣槍聲，而這一次槍聲似乎是從屋頂來的，所以我跑到門邊去觀察這些國民黨軍人究竟向誰射擊。

在大約兩百碼外的路邊，一名左腿滿是鮮血的婦女正在掙扎想爬起來。由於沒有任何襲擊者的蹤影，我決定過去援救。但就在此時，一名年輕台灣人也不顧自身安全，從附近一棟房子里出來把該婦女攙起準備往回走。但可能是在見到我后，他改變了主意，於是我們倆一起把這名婦女攙進國民黨 [軍事總部]。但那里並沒有任何急救設備。這名年輕婦女的左大腿上部中彈，大腿骨被打碎了。但是流血不是很多而且似乎已停止流血了。她的神智顯然還十分清醒。每個人都站在她身旁無奈的聽她哀嚎。

當然了，[軍事總部] 那也沒有任何繃帶或夾板可用，所以我只好要國民黨士兵把他們一些正在晾乾的毛巾撕成布條來用。這名婦女身上仍然用包袱巾帶著她的隨身物品外加一把雨傘。我於是利用她的雨傘和一片木頭作為夾板，把她受傷的部位固定，然後用黑板作為擔架，把她送往對街里有一位醫生的 [人民總部]。

這個事件完全打斷了我們的談判，雙方也似乎都不願意再恢復。由於我繼續待在這里似乎已沒有多大用途，乃透過翻譯告辭返回 [人民總部]。回到 [人民總部] 后我發現那名台灣人醫生已下令將受傷的婦女送到路底大約半英里處的一家醫院去治療。

*** 國民黨軍隊盲目掃射 ***

當我們返回旅館時，已經有幾位朋友在等候。他們一致勸告我們離開這家旅館，於是我們接受其中一人的邀請去他家做客。但是到那里我們發現，他的家已經完全被附近山頭上配備有機關槍的國民黨軍事哨所嚴密監視。但無論如何那天晚上我們還是留在那里過夜，第二天才搬到郊外一個被認為安全的旅館。這間旅館格局則是日本式的。

這天晚上城里幾個地方間歇發出了槍聲。第二天也沒有什麼特殊事件發生，只是有報導說，我們曾經去訪過的那個國民黨 [軍事總部] 里的軍人已經撤走，退到原來修建用來保衛高雄港口的要塞里。但也就在這天晚上，當我們盤腿坐在日本桌子前時，一排機關槍子彈直接從窗子射來，電燈隨即破滅。在猛地站起來時，我扭到了自己腳跟，於是只好躺在床上休息。

第二天一整天我們聽到各種不同謠言，但大體情況似乎是學生們控制了這座城市，他們已經到這家旅館征用米糧。他們也曾試圖征用我們的吉普車，但被勸阻了。無線電廣播報導了這次台灣人抗暴的目的，似乎全島都已在抗暴分子控制之下。然而就在午飯過後沒多久，突然傳來一陣機關槍聲而且槍聲逐漸向我們這家旅館逼近，所以我們就躲進一間內層房間，四周用我們所能找得到的榻榻米圍起來。

很顯然，國民黨軍隊已經開始有組織進攻這座城市。此刻為止我們所見到抗暴分子擁有的全部武器不過六枝步槍分屬於不到二十名男子。當槍聲逐漸從旅館經過而最后在遠處消失時，不免感到自己相當幸運。

從旅館里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的中國國旗飄揚在前面所提的 [軍事總部] 和 [人民總部] 頂上，機關槍手則攫取了戰略據點。不時從街角傳來的零星槍聲使我意識到國民黨軍隊掃蕩肅清的程序已經開始。槍聲越來越近，而我們的權宜之計就是再退回到我們在旅館內的避難所里。

突然間，我們聽到一聲槍聲，旅館入口處有玻璃破碎的聲音。我把頭探出來往外望，心里想現在是和國民黨中國士兵見面的時候了。所以我就沿著走道用英語高

喊：[夠了！夠了！不需要這樣！] 同時心里希望藉此也好讓他們知道我是一名西方人。

但就在我把頭轉向一個角落時，我發覺我的眼睛和其中一名士兵步槍上的刺刀尖距離不到六英寸。而我覺得他正 備開始射擊的樣子。於是立刻退回並且大聲用英語高喊，同時把頭擺低，才 口氣的發現這名士兵也把他的步槍放下。當我完全現身時，他趨前向我握手。當我叫我的翻譯上前來時，這名士兵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旅館里的每一個人在他面前排隊。

他的小隊的一名成員此時也來了，準備把旅館里的人帶往監獄。當然了，我的翻譯和我拒絕前往。但最后我的翻譯同意陪同他再度前往 [軍事總部]。當他們離開以及其余國民黨士兵也離開的時候，另外一組國民黨士兵也用同樣態度進入這家旅館。幸運的是，旅客當中有一人能說北京話，於是向這些國民黨士兵解釋情況。就在他們還在討論這件事時，我的翻譯和一名會講英語的國民黨軍官返回。接著，這名國民黨軍官把我們帶往位於高雄城外的山上要塞里。

*** 抗暴群眾手無寸鐵 ***

這位曾經參與緬甸戰役的國民黨軍官駕駛著我的吉普車。在路上我立刻看出台灣人這次反抗注定要失敗。因為街道邊和山頂上到處可見架設的機關槍，有的機關槍口徑還非常大。相對來說完全沒有武裝的台灣人自然一點獲勝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受到要塞里國民黨指揮官禮貌接待。他告訴我們說，因為共產黨煽動的關係，他們被迫攻擊這座城市。但我們這邊卻沒有看到任何和共產黨有關的人或物。隨後他們把軍需官辦公室給我們當臨時臥房，我們的床鋪則是辦公室里的桌子。當時缺少糧食，但幸運的是，由於旅館里一名旅客的先見之明，我們隨身帶了旅館特別為我們買來的面包和奶酪。

這天晚上有兩名軍官來拜訪我們，他們也是工程師而且會講英語，他們為了學習工程技術曾經必須閱讀英文教科書。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這些國民黨工程師也認為這場暴亂是共產黨挑撥煽動造成的。於是我們進行了非常有趣的討論，而且我也非常高興有他們作伴。

這晚我們睡得斷斷續續的，因為不時被機關槍的槍聲吵醒。在大約早上八點鐘起身，但是一個小時后還不見早飯蹤影。軍需辦公室曾經得到了一些新鮮蔬菜，但這些新鮮蔬菜都被拿去給隔壁的一群士兵吃，這顯示了食物缺乏，這些士兵可能已經挨餓。事實上這種現象也得到前晚來拜訪我們的國民黨工程師中的一人 [証

實]。

[証實]的過程是這樣子的：這位國民黨工程師前來向我借那輛鎖在房子前面的吉普車，但是我告訴他說，我們不可能將[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吉普車出借給他們做軍事用途。他隨即表示，他是要用這輛車做救濟用途的，他們要用這輛車去軍事商店把米運到所有大陸人都躲在那兒的避難所里，然而他們沒有運輸工具。

經過進一步商量我們得出兩項結論，第一項是這家軍事商店被抗暴群眾封鎖，第二項是，在把這些米分發給難民以前必須先運來我們所在的要塞。很顯然，那些會分發給難民的米一定是軍方已經剩下的，所以我們還是婉轉拒絕了。

*** 嚴守中立 ***

除此以外，我們也用曾經拒絕讓學生利用我們的吉普車在城里征用米糧作為例子來增強我們的立場，再三表示我們只有嚴守中立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這名國民黨工程師只好離開，而且顯然去和要塞指揮官討論這個情況，但是讓我們大一口氣的是，幾分鐘后他回來告訴我，他們已經做了其他安排。

我們的早飯終於在上午十一點拿來，但是除了拌了點醬油的水煮荷包蛋以外沒有米飯。不過幸運的是，我們還有旅館客人在最后一刻塞給我們的面包和奶酪可以配著裹腹。后來當我們看到卡車后面托著野戰炮時，才恍然大悟國民黨軍方為什麼會沒有運輸工具去運米糧的道理了。

晚餐是我們的下一餐，除了炒鴨蛋和白飯外還有國民黨軍隊的牛肉罐頭，當然了，我們也再度配我們自己帶在身上的面包和奶酪。這天晚上由於沒有訪客所以我們就早早上床，但是清晨時再度被槍聲吵醒，只是這次槍聲來自遠處。因此我希望也許我們可以回到城里去了。

早上時我們看到幾批人犯被繩索綁在脖子上帶進來。其中一名犯人獨自一人站在入口處，他的雙手手腕被鐵線綁在背后，由於綁得太緊鐵線已陷入肉里。他的兩支上臂也同樣被鐵線牢牢捆綁，同時脖子上也綁了一圈繩索。看起來已到了精疲力竭的極限，但是每當他的頭低下時，國民黨士兵就用綁在步槍上的刺刀背打他的嘴巴。

我的翻譯認為這人是我們的朋友，是[人民總部]的領導人之一而且非常反對發生毆打事件。我不認為我們認識這人，但我的翻譯堅持認為我沒有仔細體會該男子過去幾天所經受的悲慘經歷。其中証據之一就是顯然變得非常消瘦。

總而言之，不論這人是誰，眼見一個人遭到這樣對待都是令人震驚的。我們討論是否該出點力，但最后決定如果我們對這名男子展露任何興趣的話，可能只會給這名落在國民黨軍隊手中的男子帶來更多麻煩。

*** 滋事體大 ***

早飯過後我們要求返回城里，但國民黨軍隊不願意讓我們走。當他們開始堅持要我們留在這裡的時候，我指出，如果他們把「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當做他們的人犯，肯定會造成嚴重影響。但他們接下來的藉口更妙了。他們表示，我們在吉普車里可能遭到兩方面任何一方的襲擊。

於是我決定用我們的枕頭套制作一面旗子，上面寫著英文「UNRRA」，下面則是中文名稱「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幾個大字。由於我們在旗子的兩面同樣書寫，所以挂在吉普車上的時候，任何方向都可以清楚看到。

然而即使如此，在我們真正離開前還有更多困難需要克服。我們在檢查吉普車狀況時發現車子備胎不見了，而且當然沒有人知道下落。最后好不容易才拼湊出答案，原來這個備胎被鎖進一間車庫里，而擁有這間車庫鑰匙的國民黨軍官又因公外出要到晚上才會回來。不過無論如何從吉普車現有輪胎的狀況看，我們那個備胎很可能被用來四處奔馳協助鎮壓叛亂去了。

經過反復爭辯我還是拒絕接受他們為這個備胎開立的一張收據，最后他們才保證在第二天十點以前把備胎送還到我們下榻的旅館。這本來就已經夠令人生氣了，但令人氣憤的還不止於此，就在我們發動車子準備離開時，啟動器卻失靈了。國民黨軍官於是派來一名技工花了大約兩個小時才把啟動器修好，期間更讓我們坐立難安，格外不舒服。

第九章 抗暴的最后階段

當我們再度重返高雄市區時，發現吉普車上的旗子和我們原先預期的作用大不相同。我們的車子不斷被那些因為糧食被國民黨軍隊搶走而挨餓的人攔下求情。每當我們停下來時就立刻有一大群人圍上來訴說他們的痛苦遭遇。

其中一名女孩在講述她的遭遇時幾度努力忍住激動情緒，其他人群也保持一片沉靜。女孩的父親是高雄市一名有頭臉的重要人物而且他不贊成武裝反抗。但是無論如何還是被國民黨軍隊帶走后無人知其下落。這個女孩向所有可能想到的人打聽，但她的父親仍下落不明。

國民黨軍隊洗劫了他們家，擄走了所有值錢的東西包括食物，她的母親因悲傷驚嚇而崩潰。作為獨生女的她只好擔負起找尋父親的責任。但我們又能為此做什麼呢？我只有不得已的告訴她我們實在不可能做得比她已經做出的還多。

通常來說坐吉普車只需十分鐘就可以通過的市區某一部分，我們卻因為沿途不斷有民眾求救和陳情而花了將近一小時。我們首先返回了暴亂剛開始時我們停留的那家旅館，我們打算暫住那里，但那里的工作人員說他們沒有食物及其他民生必需品，而且也不知道哪里可以獲得這些東西。所以我們只好轉移到後來我們被國民黨軍隊帶走的那家旅館，同樣地，沿途又再度多次受到民眾阻攔陳情。

鎮壓之余不忘嫖妓 ***

我們回到這家旅館顯然是一件很受歡迎的大事。那里的唯一一些男子是比我們先到的軍人，他們在旅館入口處和旅館房客談天。這些旅館房客都是女人。我向這些士兵像老朋友般地打了個招呼。交談中我表示這晚我們不打算住這里，沒想到這句話換來婦女們一陣驚訝，於是我雖然還不明一個中原委，我就要我的翻譯告訴他們我已經改變了主意，決定這晚在這里投宿。

由於我的翻譯也正忙著找出事情真相，我當然就更不知情了。不過無論如何我還是看到旅館老板娘把一疊紙條塞給這批國民黨士兵為首的一人手里，不久后，這些士兵就離開了。我的翻譯這才告訴我，這些國民黨軍人原來打算今晚帶這些女孩回去睡覺的，但由於我們的到來使他們放棄了這個想法。

這天下午和晚上，這家旅館的氣氛都非常緊張，每個人都坐到我們的房間里來。她們異口同聲地訴說著國民黨士兵在這家旅館開槍強行進入的情形。她們表示，除了第一位出面和國民黨軍隊他們打招呼的老板被當場射殺外，她們全都認為，是由於我出面和這些國民黨軍人打招呼才（挽）救了一些人性命。談話里不斷夾雜著怨嘆和顫栗。在她們離開我們的房間后，我還可以聽到她們談話直到深夜。

但這些國民黨軍人所干的懦夫行為顯然不是在整個高雄市進行，而只是在某幾個地區。沒有人知道這是因為這幾個地區被認為暴亂特別嚴重，還是因為這只是某些國民黨士兵自己一時的沖動。但是不管什麼原因，國民黨軍隊這種行為畢竟在我們周遭制造了許多喪夫喪子的怨婦。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在我離開被帶往要塞的那一天晚上，這棟旅館整個被機關槍掃射了一遍，特別是在樓上部分，子彈貫穿了整個房子，有時候甚至穿越四座牆壁，因此這些子彈顯然是穿甲的機關槍子彈。

監獄人滿為患 ***

第二天我們被旅館里的人團團包圍住要求協助確定他們的親屬是否還活著，或是被關押在哪里。所以我們就前往不同的監獄詢問。每一座監獄門口此時都擠滿了婦女。她們是在發現男性親屬被關押在這里后攜帶衣服和食物來探望的。我們當然能夠保證那些被國民黨軍隊從旅館帶走的男子沒有參與暴亂，所以一兩天後他們也就返回了這棟旅館。

許多男子是在半夜三更身上還穿著睡衣的情況下被國民黨軍隊帶走的，加上監獄里又沒有睡覺的地方，使得他們個個都著了涼。同樣的，親屬因此必須給人犯送食物，盛裝食物的容器在食物送進去后被退還給等候在監獄大門外的婦女。

有一次，當我開著吉普車離開監獄時突然有人用英語高喊 [THANK YOU]，離去時人群更聚集在路旁目送。很顯然，我們的努力受到他們感激。但是在這個令人難過悲慘的事件里，我們所能夠做的實在太少了。

那位律師朋友 ***

在希望我們幫忙的要求當中，有一個是我們那位律師朋友的妻子。我們的那位律師朋友曾經反對暴亂，我的翻譯則在要塞認出他遭到國民黨軍隊毆打。我們於是驅車前往他的辦公室去看他的妻子，聽到的又是一樁令人難過之事。

她的丈夫曾經大聲急呼並且勸戒群眾不要鬧事，但是卻引來一片反對而不得不落荒而逃，群眾們甚至包圍他的住宅將之燒毀。他的妻子也遭到群眾毆打。她展示給我雙腿一片淤青，並且表示身體其他部分也到處是這樣的淤青。

她曾經因此而神經崩潰，但是當我們告訴她我們在要塞見到的那個遭國民黨軍隊毆打的人可能是她丈夫時，她的反應還很鎮定。她表示，她丈夫的兩個好朋友也幫了不少忙。其中一人已前往要塞。由於我們的備胎仍然下落不明，我乃認為現在是再去那里走一趟商量商量的時候了。

到達那里時，我們立刻和第一天晚上就來拜訪我們的其中一名軍官朋友見了面。他首先詢問我們的來意，當我們表示要尋找這個人的下落時，他的反應是："哦，他是首領。"語調中似乎暗示我們不必對他抱什麼希望。

雖然我解釋了他曾經試圖帶領人們不要參加暴亂，但沒有效果。很顯然，任何形式的領導人都是國民黨軍隊清算的首要目標。(在此希望附帶指出，這是我所見國民黨不論任何理由有系統消滅台灣領導人的第一個跡象)。此外我也表示希望找回我們的備胎，但所得的答案是一個人推一個人，最後當然是原地打轉，沒有下文。

這一招奏效 ***

我於是要求面見我曾經見過面的指揮官，正式向他表示我們的設備被用來做軍事用途因此我必須把這件事向南京報告。這一招果然奏效，他們立刻開始和各個哨所聯系。雖然還沒有查出下落，但是向我保證會在一個小時內完好的把備胎送還我們的旅館。我提醒他們已經做過同樣保證，因此這次保證也沒有多大意義。但無論如何他們指天誓地的向我保證這次絕對不一樣。很顯然這次他們是當真了，我於是滿意的離去。

在其他朋友共同協助調查下，我被告知那位律師朋友待在難民營里，所以在一名軍官陪同下我們終於找到了他並且和他討論情勢。我非常謹慎地表達並不是要求釋放他，只是希望確定所有的事實真相都能在審判時被提出。我同時準備了一項聲明，表示我曾經見過他幾次面而且相信他是一名守法的公民。其他朋友也表示做了調查。由於他的良好關係，我們那位律師朋友曾經在要塞里受到良好照顧。

我們向律師朋友的妻子報告情況后返回旅館時，得知有一輛上面滿載全副武裝國民黨士兵的吉普車來到旅館找我們，但由於我們不在所以又帶著備胎返回營區，並且保證一個小時后會再來。這一次他們倒是真守信了，並且拿走了我簽的收據。

國民黨特務頭子 ***

國民黨當局也繼續嚴密監視著我。我曾經被一名國民黨官員攔下，詢問我是否知道「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在高雄的人員。我回答說是的。這位國民黨官員于是說：「那好，有一名身穿「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制服的台灣人，在三月三號向某人索取十萬元台幣。」很顯然，他是在指我的翻譯。

我於是回答說：「沒錯，「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另外在高雄的唯一工作人員是一名台灣人，他也穿著「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制服。但他從來沒有離開過我的視線，更有甚者，他不是那種會到處詐騙要錢的人。所以不是有人偽裝「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制服詐騙，就是你的消息來源嚴重錯誤。」

這位國民黨官員於是向我道歉，並且說：「但是當然了，我們也不能不小心點。」

我回答說：「是的，的確如此。所以你如果再收到這類訊息時必須更加小心。」

回到旅館后我們把這件事描述給朋友聽后，才知道這位詢問我們的國民黨官員就是惡名昭彰的秘密警察頭子。

由於現在已很少聽到槍聲，我們猜想暴亂已經過去，但火車和電報仍然不通，因為所有電報線路已經被切斷了。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能通過軍事管道送出一項簡短訊息給我們在台北的辦公室，表示我們兩人都平安健康。

[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 在這個地區有一名醫生，他和他的妻子在台南。三名 [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 的護士在 HAITO。根據總部調查顯示，HAITO 還是個危險地方，但是台南已逐漸恢復正常。由於我的腳扭傷還沒有痊愈所以無法一口氣開車開得太遠，我們就在旅館僱請一個男孩開車送我們去台南。

台南成了死城 ***

在路上我們被兩名中國男子和一名中國女子攔下，他們要求搭便車前往台南，我們答應了。原來，他們是在暴亂發生前一天從高雄的 [東元旅社] 逃出，準備從高雄步行前往台南的。

我們到達台南時，發現台南已是個死城。每一個街角都架設了機關槍，路上看不到一個平民。我開車穿越台南市街道的時候感到很不安全，因為國民黨士兵當中很多人不識字，因此我們那面白色的 [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 旗幟可能對他們毫無意義，他們說不定認為先射擊再詢問是可行的。

我們拜訪了幾處可能會有這名醫生消息的地方，最后肯定他已離開台南去執行他下階段的任務時，我們才返回高雄。

第二天我們去有三名 [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 派駐在一家醫院工作的 HAITO。發現她們都平安健康，但是由於經歷過一些可怕經歷，她們都顯得非常不安。不過在見到我們時大大 了口氣，因為她們原來以為已經完全被遺忘了。我向她們指出，我們的電訊除了通過軍事單位和台北取得聯系外，我們也被遺忘了。

三名護士的遭遇 ***

由於她們曾經居住的旅館最初被抗暴群眾作為總部，因此受到國民黨軍隊格外注意。有一次她們在機關槍掃射中躲在入口處的一根大柱子后面，一枚子彈正好打中了這根柱子。當抗暴群眾被逐出這家旅館后，旅館里就只剩下她們三名護士，國民黨軍人則乾脆進駐這家旅館。稍后這些國民黨軍人召來女子作樂而把這家旅館變成了妓院。這些國民黨軍人只在旅館待了一夜，但旅館的工作人員除了門房夫婦外，已全部逃光了。

這三名護士曾經給門房三千元去購買生活日用品，但就在我們抵達的前一夜，國民黨軍隊來到這家旅館追索這家旅館的老板，當門房表示不知道老板何在時，國

民黨軍隊不但把他打了一頓而且還搶走這三千塊錢。三名護士於是向把她們安置在市鎮賓館的市長陳情，因為市長當時也住在市鎮賓館。但這樣一來卻惹來了更多麻煩。

一名國民黨士兵那天早上因為頭部槍傷死亡，國民黨軍隊於是逮捕三名醫生和三名護士。理由是沒有適當救護這名士兵。由於其中一名參與救護的台灣人護士是「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護士之一，所以我們全體向市長要求平反這件事。在此情況下，另外兩名加拿大籍護士覺得她們不能因此離開這名台灣人護士，於是決定留下來。

十一天才收到電報 ***

我們返回高雄看看是否能和台北聯系上。但還不等我們聯系，第二天一封郵戳日期三月四號的電報已寄過來，上面寫著：「請你立刻返回台北」。由於電報已能夠進來，我們乃認為我們的電報也可以傳出，但是到電報局打電報時才發現，這封電報是由火車和汽車經過許多人之手，花了十一天時間才到達我們手上。

第二天我們返回 HAITO 把兩名加拿大籍護士帶回高雄，並且得到消息說，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會有一班去台北的火車。至於那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台灣人護士則已經脫離因為那名國民黨士兵死亡引起的麻煩，但由於她還遠遠沒有完成在那里建立訓練課程的工作，所以決定留下來完成任務。

這些日子里我曾經為了腳傷去看一名在日本受過訓的台灣人醫生，這一天他有幾名有趣的人求診。其中一人待在屋里不肯離開，因為他擔心會被國民黨憲兵帶走。他們還訴說了國民黨軍隊擄掠的故事。一般來說國民黨軍隊的擄掠不僅僅是為了糧食和設備不足，而是為了把擄掠來的東西再轉手賣出去賺錢。因此之故，國民黨軍隊幾乎沒有放過對任何有價值東西的注意。

街頭死屍 ***

但更嚴重的事實是，每天早上總有屍體躺在街頭。這些屍體都是些重要人物。他們往往是在夜晚在家中被拖出去殺害的。國民黨憲兵曾追索一名台東地區的議員。這名議員在高雄發生暴亂時經由花連和蘇澳去了台北。所以他和高雄的暴亂一點也沒有關聯。但他確實曾經一再要求國民黨政府建立法律和秩序，因此自然也就成了國民黨政權追索的目標。

第二天火車真的開動了，而我們也真的坐在其中。火車車廂由國民黨士兵把守，而且直到我十一月我離開台灣時，火車車廂兩端的座位還是由國民黨士兵 著。此外當然了，火車站的所有重要出入口也全部由機關槍嚴密把守。

在我們上車時，一名國民黨官員也跟上了車子，他使用各種辦法希望知道我們對暴亂前和暴亂期間發生在台灣的事究竟知道多少。顯然地，他所得的印象是我們知道非常有限，由於他的英語流利和我們溝通毫無問題，最后終於放棄偵察我們[替共產黨工作]的「事實」。值得一提的是，當他痛加撻伐高雄市長時，我告訴他我們曾經應高雄市長要求，出面協助促成高雄停火。就在這名國民黨官員離去后不久，我們當中一人說：「如果他們繼續對自己說這場暴亂是由共產黨引起的，遲早他們和整個世界都會相信。」

台北更慘 ***

在高雄時我們以為我們的處境夠糟了，但比起台北的情況簡直小巫見大巫。一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女性官員住處即使在門前挂有美國國旗情況下，也遭到國民黨軍隊襲擊。幸好一名駕駛吉普車的西方人路經此處看到這種情況而(挽救)了她。因此之故，這位西方人到現在還只好駕駛他那車身有幾處彈孔連方向盤都被打掉一部分的吉普車。而這就是當時在台北的國民黨軍隊典型作風。

在國民黨增援部隊從中國大陸抵達台灣前，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利用一連串保証安撫反抗分子。然后在國民黨增援部隊抵達后就對民眾展開有系統的屠殺。一卡車一卡車滿載配備有機關槍和步槍的國民黨軍隊從基隆港兼程進駐台北。他們對掃射街道上的民眾還嫌不夠，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地對商家和住宅開火。

在台北和基隆之間的一個村子里，有二十名年輕人的睪丸被閹割，耳朵被切掉，鼻子被挖開，然后才被軍刀刺死。他們的屍體和許多其他人的屍體堆在一起達好幾天之久。在河里看到屍體漂來並不是不尋常之事。一名騎腳踏車的男孩顯然在警察下令時離開的不夠快，國民黨軍隊於是把他的雙手用軍刀砍下，然后再把他刺死。

在台北也是一樣，國民黨軍隊的習慣做法是，當他們搜索房屋時，一定把首先出來開門的人當場槍殺。

暴亂剛開始時，一群初中學生到萬華車站準備搭火車回家，其中兩名學生先進入車站向站長詢問。國民黨憲兵於是把他們叫過來並且不準他們離開車站。其他等在外面的學生不知里面發生了什麼事，也紛紛進入車站了解。這下子車站里的四五名憲兵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就對這些初中生開槍，最后打死約二十人。

國民黨軍隊繼續多天追索他們名單上的要犯，持續幾個月的時間不斷有人失蹤。更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殺害。

第十章 余波

任何暴亂都會遺留下憂傷，苦難，悲哀，憤怒，憎恨和報復，台灣的二二八事變也不例外。台灣這個島嶼從此在國民黨戒嚴法控制下。事變發生前還存在的一些生命財產安全現在蕩然無存了。國民黨軍隊可以用任何藉口進行搜索，進入民宅任意取走他們想要的東西。

更糟的是，許許多多台灣人親屬無故失蹤，不知道他們是否被誘拐殺害，還僅僅是被投入監獄，或自動躲藏起來。若就自動躲藏起來這個角度言，越少親屬知道也就越不至於讓國民黨當局藉酷刑拷打來勒索。在暴亂過後的幾個星期，每天早上還可以在街上發現在前天夜晚被槍殺者的屍體，河流里漂浮的死屍也絡繹不絕。

國民黨當局同時也致力解除台灣人民的武裝並且保證實行大赦，但由於台灣人已經上過一次當，所以對國民黨的大赦非常懷疑。就像過去一樣，有許多人因為相信國民黨的保證於是從躲藏地點出來，結果卻被警察帶走。這都是稀松平常的現象。

刀，劍，和長矛 ***

當然了，所有武器也都必須交出。雖然可能的確有一些步槍被台灣人交出來，但如果我在高雄國民黨軍事總部親眼所見是一標準的話，那麼，這些被台灣人交出來的武器大部分是刀，劍，和長矛。事實上，台灣人對自己沒有武器感到懊悔。而我所見到唯一一些台灣人擁有的步槍，只是一輛在街道上急駛的卡車里的一群年輕人所擁有的五六枝步槍罷了。

據我所知，這些步槍是在暴亂剛開始時國民黨士兵遭到襲擊時丟掉手上的武器逃跑時被台灣人揀來的。但陳儀從大陸召來的增援部隊火力可不一樣了，加上花言巧語和陰謀詭計，那些拿著木棍長矛的台灣人當然不是配備著步槍有組織的國民黨軍隊的對手，更別說國民黨軍隊還有機關槍和手榴彈呢。

在這場事變里台灣人的死亡人數一定非常多，然而這也証明了台灣人是勇敢的，在被迫走投無路情況下不惜決一死戰。

正如預料的那樣，事變之后街道上的台灣人態度有了顯著改變，其中又以孩童態度的改變最為明顯。像東方的許多地方，街道上原來都擠滿了玩耍的孩子，台灣各地的孩子也習慣爬上我們的吉普車來玩，我們在各處總是會遇到歡笑的孩童

向我們揮手打招呼。這種現象尤其在我們從辦公室前往我們的工作地點穿越各個不同村莊時最為明顯。有時候他們會叫出 [HELLO] 或 [O.K.] 這樣的英語，有時候則變調成了 [HELLOKAY] 這樣的自創英語。

孩童失去歡笑 ***

但是在事變之後，不但街道上很少看到人而滿臉愁苦的孩子顯然也沒有心情再和我們興高采烈打招呼了。有時候我看見一些婦女和男孩在牛拖的犁後面艱難的耕田，心里不禁在想，他們是不是承擔起父親的工作了？因為他們的父親或丈夫已經為了自己家園重新獲得自由而犧牲了。

但究竟台灣人為什麼而死？台灣人究竟有什麼原罪？從前面一些章節來看一些理由是很明確的，但是台灣人對全世界廣播所提及的目標也許才更具有非凡的價值。

大概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這一天，台灣全島幾乎全部在抗暴分子的控制之下，那時候從大陸來的增援部隊也還沒有抵達。就在這天晚上，反抗分子政治聯盟的主席張先生從台北電台廣播，概述了導致暴亂的一些事件。他同時也概述了這次反抗的目的（關於此我們將在下一章仔細討論）。很顯然，他們所標舉的目的沒有一項不合理。他們只是要求一般的民主權利。

國民黨當局在這個時候很可以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但無論如何，可能是陳儀和國民黨軍隊認為讓台灣人做主簡直太 [失面子]，於是決定不計一切后果要奪回這個權力。但是也有可能是，他們認為對台灣人的這類要求應該進行 [血洗]，這就是國民黨政府 --- 特別是台灣行政長官陳儀 --- 對台灣人指責他們行事不公的公開答覆。

陳儀與蔣介石 ***

陳儀是國民黨指派的第一位台灣行政長官。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一年期間曾經擔任福建省主席，但後來由於經濟凋敝和虐殺無辜被撤換。然而陳儀在福建所造成的災難顯然又在台灣重演。陳儀和他屬下的國民黨官員不久就發現台灣對他們來說是非常有利可圖的。

經由觀察者的仔細舉報，國民黨和蔣介石充分了解台灣這場暴亂的情況，而且是在暴亂開始的頭三天就收到這些訊息的。然而蔣介石卻仍然準許陳儀遂行他的血腥做法直到兩個月后才把他調職，但此時已給台灣人和大陸人之間的關係造成無以彌補的損害了。另外要指出的一點是，反抗分子政治聯盟主席張先生在台北電台的廣播里曾經表示，他們並沒有打算脫離大陸獨立，但是到二二八事變被國民黨軍隊鎮壓後，他們的想法徹底改變了。他們徹底醒悟，在中國人手上台灣

是不可能獲得社會，經濟或精神上自由的。

第十一章 誰的罪責？

正如前面提到過的，台灣人在抗暴期間已明確提出了他們的目標。政治聯盟主席張先生於三月五號從台北電台所做的廣播里對此做出了詳細說明。他表示，他們並沒有打算改變中國政府的統治，他們只要求中國政府改變統治方式，他並且要求：

一．造成問題的責任在國民黨政府。

二．台灣省政府里一半機構的負責人應該由台灣人出任。

三．[貿易局] 和 [公賣局] 應該取消。

四．在接收日本留下來的工廠里，重要職位應該由合格的台灣人出任。

五．市鎮長和市鎮議會應該由人民投票選出。(特別是市鎮長都是國民黨指派而且往往有軍方背景，此外他們對議會更擁有完全的否決權)。

六．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和組織政黨的自由是台灣人應有的權利。

七．政府應該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和權利。

國民黨的標 論調 ***

但在另一方面，台灣省政府所屬的 [新生報] 則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或二十日發表了題為 [誰是罪犯] 的一篇社論。主要論點如下：

一．那些和日本合作經營的台灣人企業家仍然夢想台灣回到日本懷抱，這樣他們就可以重溫日本統治下的既得利益。但目前的中國政府不會容許這些買辦獲得利益。這些利益應該歸國家所有。於是這些企業家就煽動青年暴亂反對政府。

二．[台灣人政治促進協會] 的領導人因為本身的政治野心在過去不斷從各個角度攻擊政府，這種趨勢終於導致年輕人發生暴亂。

三．挑撥學生情緒的新聞從業人員已經濫用了言論自由特權，經常傳播攻擊政府的思想。

四. 這三種人應該為這次事件負責. 在過去, 中國政府對這些人太寬厚, 由於這次事件是一項有良好計劃的反國家暴亂, 因此這些人將根據法律受到懲罰. 善良的人不需擔心他們的生命. 政府會保護他們, 被派遣來的軍隊也就是要做這些保護的.

對任何不熟悉背景不了解事實真相的人來說, 國民黨政府的這些聲明似乎合情合理, 但「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在台灣的官員早就學會了對國民黨官方宣傳必須持保留存疑的態度. 有些人甚至發現, 和國民黨當局所宣傳剛好相反的方向去想, 往往才更為正確.

睜眼說假話 ***

作為西方人所說「事實」的一個例子, 也許我可以引述「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一名官員的親身經歷, 這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在拜訪一間國民黨政府機構辦公室時, 發現他要拜訪的人當時正在準備向二二八事變不久后前來台灣了解狀況的(巍)德邁將軍做簡報.

這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正巧看到攤在桌子上的這張報告, 由於內容是他和國民黨政府共同協作的有關工作, 所以他自然就仔細看了看. 當他發現這份報告所講的大部分內容是還要一兩年才能完成的計劃時, 忍不住對這位國民黨官員指出:[你說我們已經全部完成了這些, 但事實上並沒有. 這都還只是建議而已.]

當他聽到國民黨官員回答后更是瞠目結舌. 這位國民黨官員說:[是的, 的確如你所說, 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為了避免讓人相信國民黨政府已成功地誤導(巍)德邁將軍, 曾見過(巍)德邁將軍的在台美國人非常有信心地表示:[他知道事實真相].

因此之故, 實際情況似乎要比「新生報」社論所說要多得多. 最顯著的要點是, 上面所提到的三種人, 具體來說也就是: 企業家, 「台灣人政治促進協會」成員, 以及新聞從業人員, 是國民黨政府準備消滅的目標.

黨營事業 ***

在日本時代, 台灣的私人企業往往營利不少, 但是在國民黨統治下這些私人企業正逐漸衰亡. 這種現象的直接原因我在前面的章節已經提到過. 但這種凋謝其實再三說來還是出自嚴厲的法規. 我真的這麼認為, 當台灣人企業家最后終於不得不放棄掙扎時, 他們的企業可能會被國民黨官員按照中國式的條件買下. 然后這些國民黨官員可以在解除限制的情況下自己經營, 如此所謂私人企業又再度蓬

勃了，但這是在國民黨手中，而且表面過程一切合法。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的看法不正確，國民黨照樣可以把原來在私人手中的企業利潤轉變到政府手里。從額外「榨取」照樣獲得財富，其美妙就好像這些國民黨官員已經擁有自己的公司一樣。

這篇社論里其他和台灣私人企業有關的部分簡直像孩童吹牛一般可笑。堂堂一個國家的政府竟然公開稱一船一船的稻米，煤炭和食糖運往中國，一船一船的鹽運往日本但台灣人卻得不到半點好處，反而說利潤應歸給國家，簡直滑天下之大稽。

但在台灣人企業家這方面，他們不但沒有因此去煽動年輕人暴亂，反而大部分台灣人企業家都反對暴亂。他們太實際了，太頑固了，無法理解一旦國民黨增援部隊從大陸開到他們就什麼機會都沒有了。於是從國民黨官員的觀點看，誣蔑台灣人企業家可以導致獲利可觀的生意。

台灣人政治素養太差？***

關於這篇社論的第二段，成立「台灣人政治促進協會」是為了在新憲法下教育年輕人，並且為民主政府做準備而訓練他們，而民主政府則是一九四六年十月中華民國新憲法里所宣稱的。很顯然，陳儀見到了如果台灣人能夠建立一個民主形式的政府他所必須面對的危險，因此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陳儀宣布，由於台灣人政治素養還太差，所以在一九五〇年以前台灣人還不能完全享有憲法賦予的權利。

我個人的看法是，一般來說台灣人的政治素養比中國人進步得多，台灣人對公共福利既關心也有良心，就這一點言，我在一般中國人里面一點也看不出。因此對於像陳儀這樣狡猾的國民黨老吏，當然充分了解一個強盛的「台灣人政治促進協會」所帶給他的極權政府的威脅，因此二二八事變給了他鏟除這個潛在政治麻煩的機會。

同樣的，這種情形也適用於新聞從業人員。這些台灣的新聞從業人員從一開始就被國民黨當局視為麻煩。因為這樣一個腐爛的政權怎麼可能容忍對他們行為公開批評的探照燈呢？於是乎，暴亂也給了國民黨政府鎮壓的好藉口。

事實上，這項暴亂給陳儀收緊對台灣的控制提供了絕佳機會，這也就是說，這項暴亂其實是陳儀和其親信所衷心渴望的。自陳儀出任台灣行政長官后，台灣的狀況簡直就是他在福建時的翻版。的確，陳儀後來被趕出福建，但在台灣這樣嚴重的暴亂和鎮壓結束兩個月之后，陳儀才被撤換。顯示了他在國民黨里一定得到極

大的支持，即使他要為「戰后世界最大的暴行」負責，也不受影響。

逼台灣人造反 ***

正如前面已提過的，台灣人並沒有採取中國人的掠奪戰術去搶奪日本人留下的資財，反而以柔順姿態接受這個事實。但陳儀可能低估了台灣人的戰鬥精神和脾氣。因此二二八事變來的可能比他預期快了點。任何了解一九四七年初台灣情勢的人都會很明顯知道，國民黨政府的整個政策遲早產生嚴重問題，只是很少人想到會發生這麼快罷了。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和朋友討論這件事時，曾經大膽預測不出這年底台灣就可能發生暴亂。

為了支持我所說陳儀想激怒台灣人造反是他深思熟慮的政策，也許還可以舉國民黨當局對台灣人領導者有系統的清洗作為例子。這種程序甚至延伸到學校里，造成有如此多的學生失蹤乃至完全無關的學生也心懷恐懼到不敢繼續求學。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由於職責的關係我必須就台灣大學的技術設備提出報告。我在一整天訪問台大期間赫然發現，盡管國民黨當局告訴我台灣大學總共有兩千名學生，但校園里卻顯得一片死寂，不論是教室內外都難得看到幾名學生。

當我詢問這兩千名學生都到哪里去了？得到的解釋是：他們都分散在不同樓房里，而且他們也不會都在同一時間來學校。但台灣人朋友告訴我說，這種現象証明了國民黨的恐怖主義在學生當中確實存在。

張七郎父子 ***

尤其是對一名台灣人領導者進行了卑鄙鬼祟的清算。這個事實不容抵賴。在台灣東部的鳳林有一位名叫張七郎的醫生。他是鳳林當地長老教會的一名長老。一九四六年時曾經是南京國民黨政府的台灣代表。同時也是台灣東部一位著名的領導者。

他在擔任鳳林鎮長時公開呼吁國民黨政府處事公正。他的這種要求肯定不受國民黨官員歡迎。他有三個兒子，其中兩個剛剛從醫學院畢業，另外一個兒子則在中國大陸擔任國民黨軍醫。他們當中沒有一人和暴亂有關。但是無論如何在一天晚上，張七郎和他的兩個兒子被國民黨憲兵從家中帶走殺害。

他們的屍體於幾天後在一處墓地被發現。張七郎的第三個兒子由於曾經是國民黨軍醫而幸免一死，但仍被投入監獄。我知道這件事時，這件事已經發生兩個月了，但國民黨當局還是不肯釋放張七郎的第三個兒子，因為他們擔心他可能引起麻煩。當我把這件事告訴來自台灣東部的友人時，他們對張七郎遭國民黨政治謀殺無不悲傷落淚。

究竟什麼原因促成了這種事發生？很顯然，一個群龍無首的台灣更容易遭到劫掠。

第十二章 新政

當陳儀最後終於被調走后，新任台灣行政長官 --- 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中國駐美大使的（魏）道明保證要進行改善。國防部長白崇禧將軍也對南京國民黨政府就二二八事變提出完整的報告，蔣介石委員長則對白崇禧所提建議照單全收。

國民黨當局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公布聲明指出，新任台灣行政長官（魏）道明的政策將以大陸人和台灣人的共同合作為基礎。公賣局和貿易局將予以取消，以 "防止剝削和操縱台灣當地的生產性企業"。與此同時，為了改善台灣經濟狀況，當局也鼓勵台灣人籌組工業生產方面的企業。

台灣的農業也將予以重建，公有土地分配給台灣農民。另外也會採取措施來減緩台灣的失業現象。

台灣人的願望 ***

與此同時，在南京的台灣代表則向（魏）道明提出了一份在台灣實行新政的冗長建議書。其中包括：

- (一). 停止在台灣清算。
- (二). 釋放所有被逮捕的人。
- (三). 將所有陳儀任命的官員革職，不管此人是台灣人還是大陸人。
- (四). 對二二八事件成立調查委員會。
- (五). 解除新聞管制。

在台灣這一方面，台灣人將（魏）道明提出的保證看作是中國人傳統裝飾的典型。他們指出，即使（魏）道明真心誠意，他也不可能做到這些。主要困難來自台灣的國民黨官僚，這些人在陳儀主政時已得了太多好處。所以說，南京的台灣人代

表向 (巍) 道明提出要求清除陳儀任派的官員時，是一種非常實事求是的作法。

除了和台灣經濟有關部門外，中國大陸不可能有任何其他職業有這麼好待遇。取消專賣局和貿易局會使他們許多人丟掉飯碗，因此他們一定會強烈抗拒 (巍) 道明在這個方向上采取任何大幅度改革。

朽木不可雕也 ***

把台灣人引荐至負責任的職位可以減少再僱用那些已經被撤換的國民黨官員，但可以想見的是，這些被撤職的官員一定會盡一切可能防止做出任何大幅度改變。事實上有跡象顯示，有些陳儀政府的官員甚至可能采取積極步驟暗中破壞 (巍) 道明政府。不幸的是，在我一九四七年十月中旬離開台灣為止，(巍) 道明並沒有做出任何非常明顯的改變。

雖然 (巍) 道明这下子的確任命了許多台灣人出任重要職位，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些所謂「台灣人」其實許多都是長期住在中國，他們的想法觀點其實和大陸中國人完全一樣。雖然 (巍) 道明政府會說他們在政府最上層已完成了有效重組，但遺傳自中國古老專門剝削被統治者的不公正式政府體系依然存在。一般人生命仍然沒有保障。他們仍然受到政府官員的恐嚇威脅和騷擾。甚至遲至一九四七年十月我還可以舉出這方面的例子。

我當時有一個機會去台灣內陸山區檢查木材生產設備，我們返回城鎮的時間被迫比預定要晚許多，所以當我們接近一座大橋時已經過了半夜十二點一刻了。當我們要接近大橋時發現有幾輛軍車朝我們開來，但我們繼續前行。在快到橋時我們被幾名態度粗暴的國民黨士兵攔下來，他們粗暴的態度並沒有因我的翻譯解釋我們是因公出差而有所改變。我們還是被從車子里強拉出來。

*** 奇跡發生 ***

最后由於我的翻譯認出這些軍人的番號，於是告訴他們說，他認得他們的指揮官而且把指揮官的名字說出來。奇跡接著發生了。鞠躬哈腰，道歉和諂媚的笑容立刻取代剛才敵視粗暴的態度，我們也就被允許繼續駕車回家。很顯然，阻擋我們的原因是過了午夜后沒有車輛可以通過橋梁。當地人看法是國民黨當局擔心軍火走私。

到我離開台灣時，台灣人民還一直被國民黨警察粗暴對待，特別是在火車站關口排隊時。警察的惡劣態度也一視同仁，並沒有因為年紀和性別而差別對待。台灣人因此不斷抱怨，即使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也沒有遭到這麼惡劣的待遇。

同樣地，甚至到暴亂發生過後的一九四七年六月時，我投宿的一家旅館還在凌晨三點被警察闖入。這些警察事先狠狠敲了門，但還不等旅館老板下樓應門，就已經破門而入了。他們大聲咆哮急急切切地搜尋除了我投宿以外的所有房間。很顯然，他們還在為搜尋二二八事變叛亂者而對旅館進行例行檢查。

*** 四大自由 ***

一九四七年八月底當我和另外兩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在台中的時候，也受到警察極大騷擾。由於騷擾太厲害我們不得不向台中市長報告。市長在向我們道歉後解釋說，由於有一項報告說有三名共產黨分子偽裝成一名教授和兩名學生潛進台灣島，我正好被認為是那名教授而另外兩人則是我的學生。

台灣人的心情並沒有改變。(巍) 道明主政究竟能否成功還有待觀察。但是台灣百姓對一些半調子措施顯然不感興趣。台灣人希望民主。他們要自己管理自己。他們希望正義。

事實上，他們所希望的正是我們所說的「四大自由」。(譯者注：即美國總統羅斯福於一九四一年提出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第十三章 基督教的影響

長久以來台灣島上一直存在著三種基督教傳教活動。其中一派源自於加拿大的長老教會，一派源自於英格蘭的長老教會，一派源自於羅馬天主教。所有這三派基督教在台灣的做法都相當類似 --- 傳播福音，興辦學校，從事醫療服務。而且這三派基督教也都在台灣算是相當成功。

遺憾的是，我對天主教在台灣的活動所知有限，但是和台灣長老教會的活動則接觸很多。部分原因是我本人生長在一個長老教會家庭，更主要的是我的翻譯雙親是台灣人基督徒，他的大部分家人和基督教會關係密切。我的翻譯本人曾在日本接受教育後，在美國拿到神學博士學位，並且在美國的一間日本人教會工作。更有甚者，「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和台灣島的基督教傳教活動也有密切聯系。這主要原因是日本人在戰爭期間壓制基督教傳教，因此基督教會必須在很艱難的環境下掙扎。

長老教會 ***

二次大戰特別是盟軍轟炸接近尾聲時，除了私人建築物以外也摧毀了許多教會建築。戰爭結束時發現，台灣的基督教教堂或多或少受到損害。他們因此也和社區的其他部分一樣，面臨了重建的困難：建築材料缺乏，物價高漲和通貨膨脹。但無論如何教會還是本著真正的基督徒精神，關心鄰居的困難盡全力去幫助他們。至於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活動則因為兩個不同教派合並成「台灣人長老教會」而有所加強。

此外，有一項意料之外直接由於戰爭而起的發展出現了，這項發展可以成為台灣島基督教力量的巨大來源。那就是，被日本征調送往南洋群島和美國人作戰的台灣軍夫多半是台灣中部山區的原住民。日本人向他們宣傳西方人都是野蠻人，不但虐待俘虜而且把俘虜折磨至死，有時候甚至要他們自相殘殺吃對方的肉。這些台灣原住民似乎相信這點，因為這也符合他們的傳統。因此當他們作戰受傷被俘虜但受到和美國軍人一樣待遇時，你可以想象他們驚訝的心情了。

因此不必等到獲釋，就在療傷期間他們就已再三討論為什麼對待俘虜要這麼好的問題。最後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這是由於美國人的宗教，於是在戰爭結束回家后就認定基督教是一件「好事」，他們的族長也同意這個看法。他們知道基督徒有一個聚會地點叫做「教堂」，於是也建立教堂。但他們如何變成基督徒呢？

[麥子已經成熟] ***

從台北來的傳教士也許會驚訝地發現，當他到達山腳下時會受到一名族長率領六百名男子從山上下來歡迎他，要求向他們解釋基督教的道理。這種現象顯然已在所有台灣原住民當中發（孝）。

不過無論如何，台灣原住民地區的教堂還是被盡可能充分利用。舉例來說，在有大量原住民居住的花連，那里的教會在星期天就有四台禮拜，更別說主日學了。

我第一次訪問花連時曾去過這間教會，當時是由旅館一名服務員帶路，另外由一名非基督徒的工程師任翻譯。很顯然，花連地方過去很少見過西方人，因為當我走去教會時，許多人特別是小孩子跟在后面越來越多。我們比救世軍吸引人們上教堂的鼓號樂隊還管用。教堂里不久就擠滿了人。而且還不只此，甚至連敞開的窗戶外，也擠滿了向教堂里張望的人的臉孔。

從某種角度而言，台灣基督教會的禮拜是很有趣的，因為所有禮拜的聖詩或贊美歌曲都是憂傷緩慢的調子。幸運的是，台灣話有一種羅馬式拼音文字，這使得西方人能輕易地從文字里知道聲韻，如果這名西方人熟悉這個調子，即使不知道這些話的含義也可以立刻加入歌詠。

牧師在這個特別日子裡的演說也相當合適。因為當我問我的翻譯剛才牧師布道的主題是什麼時，他回答說：「麥田裡的麥子已經成熟，但收割者在哪里？」就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而言，這個布道顯然也可以解釋當時的局勢。

基督徒的行徑 ***

一名台灣人基督教牧師向我解釋說，大戰剛結束時他們在每一方面都非常困難，但一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官員鼓舞了他們，使他們獲得新的勇氣和信心去繼續從事他們相信必須在台灣努力以赴的重要工作。事情是這樣子的：

一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和他的翻譯在花連等火車時，遇到了一名非常（簽）誠的台灣人基督徒，見面寒暄之後這名聯合國官員的翻譯就向他介紹「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工作，接著又聊到這名官員的個人問題，譬如說他是不是是一名基督徒啦等等。

當時由於火車里非常擁擠，在花連以南一個小站上來了一名年輕媽媽，背上背了一個嬰兒，一手牽了一個小孩，另外一手則（挽）了一個包袱，顛巍巍地站在距該「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不遠處，而且壓根兒沒想到會有人讓位子給她。但這種情形對這名聯合國官員來說實在有點看不過去，於是起身把自己的座位讓給她。起初她拒絕接受，但因為這名聯合國的堅持，最後還是接受了。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們在花連車站遇到的那名台灣人基督徒開始對車廂里的人發表演說。乘客則很專心的聆聽。他的演說持續了大約二十分鐘。演說結束後這名聯合國官員問他的翻譯這項演說談的是什麼時，翻譯簡潔的一個字回答說「你」，著實讓他嚇了一跳。

他的翻譯接著更詳細地解釋說：「你是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派來的一名官員，這個機構是負責分發救濟物資的，這個地區也收到了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分發的救濟物資。你是一名（簽）誠的基督徒而且又是他們的客人，但是當你的主人們都坐在那兒動也不動讓那名年輕媽媽艱難地站在車廂里時，你這位客人卻讓出了座位。日本人曾經告訴他們說西方人是野蠻人，不但殘暴而且還吃人肉。但你的行為卻不是野蠻人的行為。你的行為是慈善者的行為。看看你穿的衣服，這比任何台灣人都穿的整齊。這顯然不是野蠻人會穿的衣服。你是屬於那個發明精妙無線電的人群里的一分子。你為什麼來到這裡？你為什麼送來這所有的食物，衣服和肥料來幫助他們？這是因為你是一名基督徒的緣故，上面這些事都是基督徒樂於去做的事。然後他就開始了一場有關基督教的精采演說。他真的是最好地利用你給他創造的機會。」

*** 言行不一的中國式基督徒 ***

許多在台灣的基督徒活動經常圍繞在「基督教青年會」進行，因此你在街道上各種各樣漢字招牌中往往可以看到用英文大字字母書寫的「YMCA」這塊招牌。「YMCA」和澎湖的基督教會已合作舉辦活動，類似的合作也在其他地區進行，其中特別是台北市，基督教會的許多禮拜都在「YMCA」用北京話舉行，使得「YMCA」的設備變得不敷使用。於是有些禮拜就移往一間已經部分遭廢棄的教堂舉行。

參加這些特殊禮拜的多半是中國大陸人，我經常懷疑這些中國人把每周日的所作所為在星期天做禮拜向上帝祈禱時會不會感到汗顏？我這裡舉一個例子，在一次晚宴上，一名年輕的中國人注意到我沒有喝那些不斷送到我面前來的日本清酒和啤酒。他問我是不是禁酒主義者，我回答說基本上是的。他於是接著說：「那你一定是基督徒。」對於這個猜測我也表示同意。他於是補充道：「我也是一名基督徒，一名倫敦派來的傳教士，但我恐怕不是一個非常好的傳教士，因為我不但喝酒而且抽煙。」

我不認為這反映了目前作為一名標準基督徒的理想，但許多牧師告訴我，在台灣，他們的確感覺這裡的基督教信仰觀點和西方有相當的區別。

此外還有證據顯示台灣省政府對基督教也不太友善，特別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時，台灣省政府還向教會建議以後在台北最好不要再增加英語禮拜。由於台灣局勢動蕩，教會方面認為權宜之計還是接受這項建議。

*** 私人接觸，人品感召 ***

有些人反對基督教在台灣傳教工作，我個人不同意這個觀點。但我也認為在今天這個通訊便捷迅速的時代，除了派遣傳教士傳教勸人信仰上帝外，還有其他一些事情可做。我們可以設想出一些辦法，讓基督教的理想和其他人更廣泛的交換且相互得利。

舉例來說，如果台灣的基督徒在掙扎維持宗教信仰的時候能夠得到如太平洋地區其他基督徒的積極支持，這對他們將會是很大鼓舞。而這可以透過台灣人和西方人之間的個人通訊而達成。畢竟，就是通過這種個人接觸而使早期基督教擴展開來的。

目前，台灣人正在和巨大的困難作戰。這些巨大困難一方面來自他們生活條件艱巨，一部分也由於台灣和西方世界知識上的隔閡，而西方世界可正是基督教的根據地。至於語言的困難並不如想象那麼嚴重，因為英語已成為所有台灣人進一步

接受高等教育的必備能力，而且是中學里就開始教授的科目。

我所建議的這類辦法對英語系國家而言想來不是什麼難事，但還是聖經上的一句老話："麥子已經成熟，但收割的人在哪里呢？"

第十四章 前景何在？

一九四五年八月，蔣介石對最高國防會議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一次聯合會議發表演說時，在談到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原則時表示：

[如果在中國本部主要省份以外的邊疆民族團體具有自治能力，有強烈決心爭取獨立，而且不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可以達到上述兩個目標，我們的政府就應該本著友好的精神，主動義務地協助他們實現他們的自由，應該永遠以和中國一樣平等的兄弟之邦來對待他們。我們不能因為他們選擇脫離母國而對他們採取惡意或偏見的態度。]

[我們也應該給予在中國本部各主要省份里的大小少數民族團體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權利，不阻撓他們的經濟和宗教自由，如此才可能在所有民族團體間發展出和諧的氣氛及友好合作關係。]

在上面這短短兩段話里一共用了三個「應該」，但我們很難肯定蔣介石真正的用意是用來表達一項政治責任還只是一種意願。但不管怎麼說，對一個品德一貫的人來說，理所當然的，責任會變成一種意願，意願也會變成一種責任，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在這個含義上過分仔細分析。

空口說白話 -- 放屁而已 ***

事實的證據是，蔣介石和國民黨知道當民族團體符合他所說的這些「如果」---也就是有自治政府的能力，有爭取獨立的決心，在政治和經濟上也有條件這麼做---時，他們的責任是什麼？

台灣人已完全展現了具備所有這些條件而且也將之讓蔣介石注意到。但即使台灣人聽到了蔣介石這篇演說，他們 --- 就像其他任何熟悉中國式演說的人那樣 --- 不會因此感動。台灣人現在更強烈地了解這篇演說有什麼價值。

台灣人雖然發現 (巍) 道明和他的 [新政] 帶來了些微改善，但是到目前為止 (巍) 道明的保證並沒有太多用處。那些造成貧困，卑劣，飢餓和奴役的中國大陸人並沒有被逮捕。理由顯而易見，因為這些人正是 (巍) 道明政府手下國民黨中國人系統的基本成員阿。

許多有能力可以運作貪污系統的國民黨官員就有能力積聚大量財富。當然了，有時候有些國民黨官員的確因貪污受到處分，但知情者無不認為這是因為他們把得來的好處分給上級不夠的緣故。當然了，事實上也有誠實的官員努力工作不貪污，但由於這種官員數量太少而貪官數量太多，使得這些誠實官員對台灣整體經濟造成不了多少影響。

取決於紅包大小 ***

舉例來說，進出口貿易可以在有限範圍內進行，但究竟能不能實現則大部分取決于紅包送的多少。通常進口商都是把他們需要送出的紅包金額增加到貨物出售價格里。也就是說消費者物價因此被提高了，從而影響到整個生活成本的增加。

一般相信這些紅包必須送給如此多的海關和港口官員，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台灣本島一百塊錢可以買到的東西，到澎湖要一百八十至兩百元才買得到的主要原因了。在日本時代，台灣本島和澎湖兩地的金錢購買力並沒有任何不同。

下面這個真實故事雖發生在上海，但是對於中國人的紅包文化仍然是一生動有趣的寫照。

一名小姐走進一間理 (發) 店里向老板自我介紹她是 [民政局] 派來通知老板欠繳所得稅的。老板表示的確如此，但這是由於繳稅期限還有幾天，所以他打算過幾天比較不忙的時候再報繳。但由於他表示了有錢繳稅，這名小姐於是表示她的上司很願意接受禮物。當老板問她什麼樣的禮物時，小姐回答說：[任何價值超過兩萬五千元的东西都可以。]

當老板表示他不想送禮時，小姐指出他們打算查他的賬，老板則表示他的賬目清楚願意接受檢查。但這名小姐表示，由於辦公室紙張太多因此他的賬本一定會搞丟，這麼一來他就會因為無法證明妥善保存賬本證明繳稅正確而被罰以更重的稅了。當然這個老板明明曉得該小姐強詞奪理，但不幸的是，他后來還是得將自己生意毛利中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作為紅包，事情才算過去。

知識層面很高的台灣人也非常了解國民黨政府對台灣工業的獨占措施給台灣帶來的害處。我已在前面的章節提到由於國民黨政府的獨占造成 [中國航運公司] 對運送磷酸鹽礦的超額收費。

*** 消費者養廢物 ***

台灣的工業也受到國民黨政府裙帶系統的嚴重影響。在國民黨裙帶系統下，所有利潤豐厚的職務都由親戚朋友把持而不問此人能力。換句話說，一間機構里的重要職位如果由一名無能者把持，其所造成的損害是還用問嗎？

通常來說，給予無能者這項職位的上級本人一定有足夠關係保住這名無能者留在該職位，不管這樣做所造成的傷害多大，這間機構也只好因為這名無能者所帶來的負擔掙扎生存。如果這名無能者一點工作也不需要，他所獲的高薪（或乾脆說紅包）仍然得額外加在企業身上，間接造成了消費者負擔。

前面已舉過許多例子解釋紅包如何防礙正義和公正，而台灣人也發現，在國民黨中國人手里是不可能獲得公正和正義的。我已經指出，即使在日本人過去嚴厲統治下台灣人也還可以生活在一相對來說安全的環境里，但現在卻沒有安全這回事了。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什麼樣的警察會用什麼藉口找上門來，惟有紅包才是使他們免於牢獄之災的唯一辦法。

*** 法律地位未定 ***

在台灣的國民黨中國人未來最大困難是他們自己壘積起來的痛苦和仇恨，因為他們曾經用愚蠢和殘忍的方式對待許多無辜台灣人。台灣人是一刻苦勤勞的民族，而且已經展現出願意為權利和正義而戰的決心，許多熟知這點的中立觀察家因此預測台灣還會再次發生暴亂。

中國人在二次大戰后立刻用自己的手斬斷了台灣人對母國的精神紐帶，現在台灣人將盡一切努力，打破所有其他和中國大陸的聯繫。

所有這些最有趣的一個現象是，目前中國僅僅只是台灣的 [軍事占領強權]。美，英，蘇，中四強在開羅會議決定這麼做的原因，是為了鼓勵中國繼續和日本作戰，因此決定戰勝后把台灣歸還中國。換句話說，按照國際法，台灣島並沒有合法的屬於中國，至少在和日本簽訂和平條約以前還不屬於中國。（譯者注：在一九五一年二次大戰西方盟國和日本簽訂的和約，以及一九五二年國民黨中華民國和日本簽訂的和約里，都只言明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權以及其他一切權利，並未指明日本放棄台灣以后，誰取得台灣主權。）

由於台灣人教育程度已經頗高，因此只需聯合國一點初期的幫助，台灣人就有能力管理自己。在二二八事變前幾個月，台灣人就已經討論他們如何在聯合國協助

下獲得公正。他們當時就知道 [大西洋憲章] 和 [四大自由] 的內容，因此他們相信只要能夠把他們的情況訴諸國際法庭，中國人的不公平做法就會在全世界面前曝露，也會明確展示中國人並不適合治理台灣。

*** 投入母國枷鎖 ***

台灣人現在從日本枷鎖下解放出來，但是不但沒有協助他們鞏固新獲得的自由，反而是他們的母國加之於他們身上更沉重讓他們無以承載的枷鎖和壓力。因此在這里有一個問題是：在台灣的自由人民希望履行自由人民自治政府的基本權利，但他們得到這個基本權利的機會在哪里呢？

在目前這個時候，我前面已提到的在台灣肆虐的惡魔也同樣在中國大陸危害蒼生。國民黨軍隊是貪污和紅包的大本營，這使得國民黨士兵營養不良，戰鬥無力，但國民黨將領卻個個腰纏萬貫。為了彌補這些短缺，國民黨士兵必須又偷又搶但是士氣仍如此低落。因此一旦遇到訓練有素的對手，還沒有開始戰鬥就已注定挨打，這也就是說，如果國民黨軍隊不在接觸對手前趕快逃走，剩下只有挨打的份了。

除了軍隊以外，國民黨在其他行政，經濟和社會體系里也充斥著貪污腐敗現象，這種體系在台灣的運作實際上完全反映了在中國大陸的狀況。因此，把日本人在台灣奠定的堅實基礎破壞成和中國大陸一樣脆弱，只是時間早晚罷了。蔣介石的中國實際上是毀於他自己的貪污腐爛。

至于美國，為了對抗國際共產主義，花費了許多金錢來支持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鬥爭。如果國民黨上層能夠進行一場改革，有能力掃清所有弊端，美國的支持當然是有益的。但重要的是，在 (魏) 德邁將軍的報告 --- 尤其 (魏) 德邁將軍是以 [了解真相] 著名 --- 出爐以前，國民黨上層遲遲無法進行這樣的改革。

*** 美國的中國政策 *** 換句話說，美國現在的中國政策是左右為難。因為美國目前所支持的國民黨政權是一個越來越失去自己人民支持的腐爛政權。然而如果撤回目前已經給予國民黨的支持，又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勝利。所以我認為解決之道是，美國最起碼應該介入國民黨中國促使他們將軍隊做徹底改變使之能進行良好的訓練。

美國另外應該堅持的一個重要步驟是，作為接受美國援助的交換，國民黨政府必須容許一個反對黨成長。目前中國的現象是，只要一有真正的反對黨出現，立刻會被宣布為非法，其領導人立刻遭到逮捕。換句話說，全世界現在都看到一個民主的美國正在支持一個極權的中國。

雖然這也許超出了本章節原來所要探討的範圍，但際此國民黨中國最近向全世界宣稱他們舉行了有史以來頭一次民主選舉之際，我覺得有必要進一步評論來支持我上述的論點。下面所述一名目睹國民黨這項選舉的西方人的見聞，更支持了我的論點。

國民黨這個所謂有史以來頭一次的民主選舉是這樣的：每一個投票所入口處都配備了兩名荷槍實彈兼步槍上還上了刺刀的士兵把守。所謂的「選民」在進入投票所時，先把選票交給一名官員，這名官員二話不說就替這「選民」圈選了人選，然后再把選票還給「選民」，再由選民把票投進選票箱里。

*** [國民黨是共產黨的代理] ***

現在有一種看似無稽的理論是，國民黨軍隊是使中國共產黨擴大權力的最好代理者之一。當然了，主要由於又偷又搶外加強奸殺人，國民黨軍隊一向「靠土地維生」，因此更多訓練有素的共產黨軍隊雖然也「靠土地維生」，但是卻盡力不招惹民怨。

此外共產黨代理人和第五縱隊還向民眾保證會帶來更好的生活，保證會趕走不事生產的地主，取消佃農的債務。在我看中國的情況似乎是，如果情勢照目前這樣繼續下去，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必然滅亡。台灣人理解到這點，有些台灣人認為這也許是台灣人的一個生機。

二二八暴亂經常被國民黨當局歸咎於共產黨煽動策劃。然而就我所知，以及當時在台灣的西方人都沒有發現這樣的證據，但台灣目前的狀況卻反而為共產黨鋪平了道路。甚至對共產黨來說想滲透台灣也不難，他們只要向國民黨腐爛官員付出足夠紅包，就可以把武器彈藥等有用的補給運進台灣了。但是無論如何，究竟台灣的衰退是否已經到了會全心全意支持共產黨也還是有疑問的。

當然了，在共產黨統治下台灣人中會有相當一部分人的財產被共產黨拿走，但以他們現在喪失給國民黨的速度，不用太久他們也就沒什麼可喪失了，因此這些人自然會成為典型的「共產黨員」。我相信這是一個真正的危險，如果國民黨在台灣的機構不采取大幅度改變，這種危險將無法避免。

*** 基督教信仰乃希望所系 ***

然而我也感覺到，國民黨政府由於太無能腐敗因此不可能做出這些必要的廣泛改革。那麼天邊的唯一一線希望（而且是遠在天邊的唯一一線希望）就是基督教

的普及了。對那些徹底的基督徒而言，我為我做出這樣的論斷感到抱歉，因為我完全了解對於在台灣傳播天國福音還有更多令人信服的說法，但是對喚醒那些對基督教理論不甚了了的人，告訴他們基督教在台灣這種可能性也許可以有所幫助。

的確，用善良正直來克服邪門歪道是耶穌基督教誨的主軸。但作為一項短期政策，這項優點在此特殊情勢下也許並不那麼顯而易見。

有些人認為中國式共產主義不同於俄國式共產主義。究竟這種說法是對是錯並不重要，因為一旦俄羅斯認為到了把中國共產黨納入其體系之內時機成熟時，它就會這麼做的。即使中國共產黨有他們自己的標籤，但不可能強大到足以抵擋俄羅斯的壓力。

因此，現在確實存在著把台灣變成一個共產黨據點的危險。這種情況將會對太平洋地區造成嚴重影響。日本就深切了解台灣的戰略價值。隨著在基隆、高雄和澎湖的海軍基地，以及散布台灣各地的大型飛機場，台灣可以主宰接近中國和日本的通道。

很少人知道台灣距離澳大利亞只有十四五個小時飛機航程。在戰時或者平時，台灣如果在共產黨手里將可以大大支援共產主義的南向滲透，而且會大大削弱菲律賓和日本作為對抗共產主義堡壘的優勢。

*** 對日和約 ***

因此似乎有必要在即將召開有關對日和約的會議上重新考慮台灣的未來。任何重新考慮台灣地位的建議都會大大鼓舞台灣人心，自然也就會抵擋住或至少延緩共產主義的影響。

台灣人是非常善良熱情的民族，透過「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以及其他機構的工作，台灣人已對西方人形成了很大好感。在我巡回全島的工作里我經常可以發現這樣的証據，下面這個例子就是很好的一個寫照。

有一次當我和我的翻譯走回旅館時，兩名年紀大約十一歲左右的女孩緊緊地跟在我們后面，亦步亦趨。幾分鐘后其中一名女童開口問：「你們就是負責給我們提供救濟物資的「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官員嗎？」

我的翻譯指著我回答說：「這個人才是「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代表。」接著這名女孩請我的翻譯對我說：

[請表示我們對他最深沉的感謝，請轉告他 "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 為我們做的所有好事.]

我很感興趣的反問:[什麼好事呢?]

女孩回答:[肥料.]

當我們再詢問 [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 是不是就只做了這件好事時，女孩回答說:[當然不只，我們還收到衣服，奶粉等等.] 接著她還再度向我們鞠躬致謝。我的翻譯表示，他還從來沒有遇到過哪個人這麼公然的表示感謝。

*** 關鍵時刻 ***

下面這段從我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工作日志上摘錄的記錄，雖然發生地點在台灣東部，但也是全台灣的一般典型現象。

我當時在工作日志里這麼寫到:[在整個東海岸地區我都得到來自各個村鎮各個重要人物不斷表達的感謝。"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 的工作給了這里人良好深刻的印象，而日本人曾經教導他們我們是一群野蠻粗暴的人。當他們發現過去的敵人竟然這麼關心他們的福 (址)，肯定在將來會對這些人的想法和觀念造成重要影響.]

我真的確信我們已經在台灣建立了對西方民主的友好基礎，如果運用得當，這將至少可以協助在太平洋地區建立和平。但無論如何，如果台灣人發現西方民主國家拋棄他們讓他們陷入國民黨政府奴役統治的痛苦深淵，這種對西方民主的友好基礎將很快消失。

換句話說，在台灣建立公正會加強台灣人民堅定的站在西方民主陣營一邊，不會使台灣成為反共長城的一個缺口。我們可以使台灣成為我們最堅強的反共堡壘之一。

至於究竟應該怎麼做，這超出了我的能力之外，但無論如何這些步驟一定得最終導致台灣人建立起民主的自治政府。當然這也可能是在一個更大的聯邦之內。

現在是西方民主國家成為台灣一個重要且有益的朋友還是一個危險敵人的關鍵時刻了。